

中图分类号： G243

密级： 公开

UDC：

学校代码： 10094

河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学术学位)

共和国初期土耳其库尔德政策探析

An Analysis of Turkey's Kurdish Polic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研究生姓名： 王立刚

指导教师： 赵克仁 教授

一级学科： 世界史

二级学科： 世界近现代史

研究方向： 中东史

论文开题日期： 2021 年 12 月 3 日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摘 要

库尔德民族是中东四大古老民族之一，主要生活的区域被称作库尔德斯坦，位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四国的交界地带。虽然在中东地区生息了近千年，但是库尔德人并未能建立起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与此相反，其他三个民族：犹太民族、阿拉伯民族、土耳其民族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了国家。其原因主要在于库尔德人并未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民族主义理论体系。19 世纪后期开始，民族主义思想才从欧洲传入到库尔德斯坦地区。库尔德民族主义从产生之时起，就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其后的土耳其国家建构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库尔德政策制定中，国际关系、国家建构和民族主义都对其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土耳其库尔德政策正是国际体系的变动和与列强之间博弈的产物，其主要目的就是获得民族独立和捍卫领土完整；其次，从国家建构角度看，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是国家取得政权合法性的需要。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土耳其成立之后的首要任务便是通过民族构建来塑造整体的民族认同，进而取得政权合法性。最后，从民族主义角度看，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以及库尔德人相应的反应实则是土耳其民族主义与库尔德民族主义间的博弈。由于土耳其民族比库尔德民族成熟，最终土耳其民族主义战胜库尔德民族主义，成为主导性话语体系。从而，土耳其民族主义就成了土耳其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土耳其应在维持土耳其民族主体地位的基础上，适当给予库尔德人以民族权利，在尊重他们民族特性与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制定民族政策，这样才能更好的将库尔德人纳入到国家建构之中。

关键词：土耳其库尔德政策；国际关系；国家建构；民族主义

Abstract

The Kurds are one of the four ancient n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living mainly in an area known as the Kurdistan, on the borders of Turkey, Syria, Iraq and Iran. For nearly a thousand year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Kurds failed to establish a state of their own. In contrast, the other three nations, the Jewish nation, the Arab nation, and the Turkish nation, all established states on their own lands.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Kurds have not developed a mature theoretical system of nationalism. Onl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did nationalist ideas spread from Europe to the Kurdistan.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Kurdish nationalism ha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later, on Turkish stateh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urkey's Kurdish policy is the product of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struggle with the great powers, whose main purpose is to obtain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safeguard territorial integ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Turkey's Kurdish policy is necessary for the state to gain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As a multi-ethnic country, the primary task is to shape the overall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ethnic construc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urkey, and then obtain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From a nationalism point of view, Turkey's Kurdish policy and the Kurds' response is a contest between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Kurdish nationalism. Because the Turks were more mature than the Kurds, Turkish nationalism eventually triumphed over the Kurdish nationalism and became a dominant discourse system. Thus, Turkish nationalism became the dominant ideology of Turkish national policy.

This paper holds that Turkey should appropriately grant the Kurds national rights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Turkey's status as a national subject and formulate national policies to better integrate the Kurds into the state.

Key Words: Turkey's Kurdish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ation Building; Nationalism

目 录

绪论.....	1
(一)选题原因	1
(二)选题意义	1
(三)研究现状	2
(四) 研究方法与相关概念的说明	5
第一章 库尔德民族主义缘起与早期发展	10
第一节 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10
第二节 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库尔德政策	15
第三节 一战后条约中的库尔德自治国	20
第二章 土耳其库尔德民族政策的国际关系视角	25
第一节 一战后列强构建的国际体系与中东格局	25
第二节 一战后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与民族自决理论	28
第三节 突厥民族与库尔德民族展开了组建国家的竞争	31
第四节 凯末尔政府对库尔德政策的国际政治分析	34
第三章 土耳其共和国库尔德民族政策的国家建构视角	37
第一节 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与土耳其民族主义	37
第二节 执行扼杀与同化库尔德民族的政策	39
第三节 库尔德民族的抗争成为长期影响土耳其政局的因素	42
第四节 土耳其国家建构与库尔德政策	45
第四章 土耳其凯末尔政府库尔德政策的民族主义视角	47
第一节 土耳其民族主义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博弈	47
第二节 突厥民族与库尔德民族间的发展差异	52
第三节 成熟民族应尊重落后民族的权利	56
总结.....	58
参考文献.....	63
(一)英文文献	63
(二)中文文献	65

绪 论

（一）选题原因

库尔德民族是中东古老四大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等国的交界处，历史上将这片区域称之为“库尔德斯坦”，即库尔德人聚居之地。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于奥斯曼帝国末期，当时积贫积弱的奥斯曼帝国是列强瓜分的对象。为了维持自身的存续，帝国开始进行自我改革，因而将西方国家的先进思想引入国内，其中就包括民族主义思想。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库尔德人逐渐有了自身的民族意识，发展出了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最早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体现便是 19 世纪末期的乌贝杜拉起义。此后，在此基础上，库尔德民族主义不断发展。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库尔德人开启了他们的建国历程。一战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国际格局，战争造成的冲击使奥斯曼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战后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给库尔德人建国带来了一线契机。然而，一战结束后的 1923 年协约国与土耳其签订《洛桑和约》断送了库尔德人的建国的前途。结果库尔德人被分割到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四国境内，成为四个国家的一部分。对于土耳其来说，库尔德人成为土耳其国内最大的少数民族，因而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较突出。在土耳其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迄今为止，库尔德问题依旧是土耳其国内的一个滥觞。如何更好的解决库尔德问题就成了历届土耳其政府所要考虑的重要事项。因而，本文以土耳其库尔德政策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从国际关系、国家建构以及民族主义三个视角对共和国初期土耳其库尔德政策做综合性的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合理的土耳其库尔德政策。

（二）选题意义

作为中东地区古老的民族之一。库尔德人虽在历史上曾建立过短暂的库尔德国家，但大部分时间处于异族统治之下。库尔德人虽然在地理上连成一片，但却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关于库尔德问题国内外研究的较多。本文以土耳其库尔德政策为切入点，重点从国际关系、国家建构及民族主义三个视角对土耳其库尔德政策做出客观性评析。目前学界从国际关系、国家建构以及民族主义评析土耳其库尔德政策的论著不少，但将其综合起来全面考察的不多。本文选择土耳其库尔德政策作为研究重点的原因在于，在库尔德人所属的所有中东国家中，只有土耳

其库尔德问题最为严重，因而也最具有代表性。同时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政策自然也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有着重大影响。研究土耳其库尔德政策，同样也对有库尔德民族问题的邻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研究现状

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伊始，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一直是土耳其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如何解决国内的库尔德问题历来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总体来看，由于国外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研究起步较早，因而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研究成果较为丰厚，研究范围广泛，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学术体系。

（1）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国外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研究起步较早，所以论著较为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著名英国库尔德学者大卫·麦克道尔的《库尔德现代史》^①，其中介绍了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早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自奥斯曼帝国末期至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库尔德民族主义不断发展。一战后国际秩序的重组为库尔德人提供了一个建国时机，但最终土耳其共和国抢在库尔德国之前首先建立，从而剥夺了库尔德人建国的权利，而且凯末尔所实行的强制同化政策加深了二者之间的矛盾；由多位作家共同编著的《库尔德和库尔德斯坦-没有国家的人民》^②的论文集集中的《土耳其库尔德斯坦》就涉及到了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文章首先对土耳其库尔德斯坦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其次又对早期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时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做了详细论述；英国威尔士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院的现代中东政治方向副教授阿巴斯·瓦力编纂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源》的论文集。其中法国著名库尔德学者哈米特·博扎实兰的文章《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从联合到反叛》^③就介绍了从奥斯曼帝国灭亡到土耳其共和国诞生这一时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文章首先探讨了从奥斯曼帝国灭亡到土耳其独立战争之间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其次论述了影响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最后则写到凯末尔共和国的建立表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地方与中央联合政策的失败。伊拉克萨拉哈丁大学政治科学学院教授丹尼斯·娜塔莉论著《库尔德和国家：在伊拉克、伊

^①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I.B.Tauris & Co.Ltd, 2007.

^② Kendal, "Kurdistan in Turkey",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Zed Press, 1980.

^③ Hamit Bozarsalan, "Kurdish Nationalism in Turkey: From Tacit Contract to Rebellion", in Abbas Vali (eds.), *Essay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Zazad Publisher, 2003.

朗和土耳其不断成长的民族意识》^①也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有所涉及。作者认为,早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由于凯末尔实行集权化和世俗主义以及对族裔政治边界的划分,使得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受到压制。

在土耳其库尔德政策方面,也有若干论著对此有所提及。例如英国学者阿萨·伦德格伦的《不受欢迎的邻居-土耳其库尔德政策》^②一文就指出土耳其民族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义是同时产生的,并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下相互作用。虽然土耳其民族主义构建是国家构建的一部分,但由于国家对库尔德人的强行同化政策,进而也促进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土耳其政府一直在试图强行同化库尔德人,非但没有取得良好效果,反而导致了库尔德人的一系列叛乱。90年代由于国内政局不稳以及国外形势变化,土耳其开始承认库尔德身份,并给予了他们相应的文化权利。

英国学者德莱雅·巴伊尔的著作《土耳其法律中的少数民族和民族主义》^③将重点放在了法律制度与司法机构在管理土耳其多样性方面的作用,并展示了国家政策被纳入到司法体系内的过程。文章认为,土耳其的法律体系未能适应国家多样性的原因便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影响。文中探讨了土耳其库尔德人的语言政策、地方名称的修改以及对库尔德人的同化等相关政策。此外土耳其毕尔肯大学教授梅庭·哈佩尔的《土耳其国家和库尔德:同化问题》^④从族裔和宗教等内部原因以及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库尔德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指出国家镇压库尔德叛乱后对库尔德实行的政策,包括出台《安置法》、《通杰利法》以及《维持秩序法》等法律条款来维持东南部地区的秩序,而且土耳其政府也并不承认库尔德民族的民族认同,强行抹杀掉他们的存在。土耳其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让库尔德地区走向文明进程。荷兰著名库尔德问题学者马丁·凡·布鲁尼森在其著作《谢赫、阿迦和国家:库尔德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⑤中提到在1925年谢赫塞义德叛乱后,土耳其国家对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美国库尔德学者罗伯特·奥尔森在《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和谢赫赛义德叛乱:1880-1925》^⑥一书中也提到在1925年谢赫赛义德叛乱爆发后,政府对其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政

^① Denise Natali, *The Kurds and The State: e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 Turkey, and Iran*,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Asa Lundgren, *The Unwelcome Neighbour-Turkey's Kurdish Policy*, I.B.Tauris & Co Ltd, 2007.

^③ Derya Bayir,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in Turkish Law*,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2.

^④ Metin Heper, *The State and Kurds in Turkey-The Question of Assimil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⑤ Martin Van Bruinessen, *Agha, Shaikh and State-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Kurdistan*, Zed Books.Ltd, 1992.

^⑥ Robert Olson, *The Emergency of Kurdish Nationalism and The Sheikh Said Rebellion, 1880-1925*,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9.

策以抑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作者认为土耳其库尔德政策中所使用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思想最早源于 1925 年，而这些政策也在其后的土耳其库尔德政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会影响到 21 世纪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

（2）国内研究现状

相比于国外而言，国内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研究起步较晚，最早的文章发表于 90 年代，只是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做了简要的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中土建交，我国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逐渐有了新的发展，研究内容更为广泛，甚至也出现了相关的著作。例如陕西师范大学的李秉忠教授在其著作《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①中就对这一时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作者主要从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来探讨库尔德问题的起源与发展。西亚非洲所副所长唐志超的《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②从总体上对库尔德民族做了一个介绍，也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做了一个系统性的研究。除此二者外，还有汪波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③以及敏敬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④也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做了细致的梳理。除了相关著作之外，国内对土耳其库尔德研究以论文为主。例如，论文方面有张学琼的博士论文《当代中东库尔德问题》^⑤也对库尔德的问题做了一个总体性的研究。该文详细介绍了从土耳其建国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并相应的提到了土耳其库尔德政策；张屹的博士论文《当代库尔德问题研究》^⑥也对中东库尔德问题做了一个综合性的概述，他指出库尔德人之所以建国失败主要在于民族运动领导人对领导权的争夺；民族主义发展不充分；民族意识不足等原因；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敏敬的《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起落》^⑦一文详细介绍了从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时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等等。

在土耳其库尔德政策方面，也有若干论著和文章有所涉及。学者敏敬在其著作《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⑧中对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四国的库尔德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也相应涉及到了一些土耳其库尔德政策方面的内容。作者提到凯末尔的民族政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变。在共和国建立之前，为了获得

^①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② 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③ 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 2014 年版。

^④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

^⑤ 张学琼：《当代中东库尔德问题》，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

^⑥ 张屹：《当代库尔德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

^⑦ 敏敬：《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落》，《世界民族》2004 年第 6 期。

^⑧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

独立，凯末尔采取团结库尔德人的政策。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开始以建设统一的民族国家为目标而对库尔德人采取强行同化，最终导致了库尔德叛乱。之后，土耳其政府开始采取更为严厉的库尔德政策，国家对库尔德实行党禁、取缔教团，阻碍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在 30 年代末库尔德民族主义陷入沉寂。

除了著作外，国内对土耳其库尔德政策的研究也散见于一些论文之中，比如严天钦的《土耳其化政策与土耳其的民族认同危机》^①论述了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之间的“土耳其化”历史。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一心想要将国家塑造为西式的民族国家，为此对境内的少数民族采取了同化措施，最终导致了谢赫赛义德叛乱，而谢赫赛义德叛乱后国家更是加重了对库尔德人的同化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周雨佳的硕士论文《冲突视角下的库尔德语政策》^②将重点放在了土耳其库尔德的语言政策。土耳其的语言同化政策目的在于从语言方面消除库尔人的特性，最终这种语言同化措施导致了库尔德语的发展与传播受限。国内有关土耳其库尔德政策的文章很多，笔者不一一列举。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对土耳其库尔德政策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政策的实施以及影响，但并没有对土耳其库尔德政策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析。所以，本文的主要任务便是从国际关系、国家建构以及民族主义等三个维度对土耳其库尔德政策进行总体性评析，探求国际关系、国家建构以及民族主义三者与土耳其库尔德政策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来探求正确的土耳其库尔德政策。

（四）研究方法及相关概念的说明

研究方法：本文以历史学为主，辅之以民族学、国际政治学以及民族主义相关理论。

相关概念说明：

（1）突厥人与突厥民族

突厥人：历史上曾活跃于蒙古草原和中亚一代的人种。突厥人最早生活在蒙古草原西部的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处于游牧状态，居无定所。公元元年初匈奴衰落之后，突厥人迁徙至吐鲁番盆地之内。公元 6 世纪击败了柔然，建立了突厥帝国。此后突厥人又联合萨珊波斯灭亡了中亚的嚙哒人，其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中亚一带。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突厥人”在欧亚大陆形成了土耳其人、阿塞拜疆

^① 严天钦：《土耳其化政策与土耳其的民族认同危机》，《世界民族》，2018 年第 2 期。

^② 周雨佳：《冲突视角下土耳其的库尔德语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

人、鞑靼人、哈萨克人、维吾尔人等几十个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由于其有着相似的语言和相同的文化背景，故被语言学家称其为“操突厥语的诸民族”。^①

突厥民族：历史上活跃于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的民族集团的统称，也是中国西北与北方草原地区继匈奴、鲜卑、柔然以来的又一重要民族。突厥民族也曾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即突厥汗国，极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东起辽水、西抵里海、西南隔阿姆河与波斯相邻”。^②6世纪末期，突厥汗国分裂，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因此，古代的突厥民族早已不复存在，但在中亚地区还存在着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他们被其他民族称作“突厥人”。需要说明的是，如今的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体，各国都在强调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取代民族认同是大势所趋。目前一些讲突厥语的国家，认为他们与历史上突厥民族有继承关系，进而便借助突厥历史来塑造国家认同。

实际上，“操突厥语的诸民族并非突厥族的实际后裔，因为突厥族在8世纪早已消亡，余部也与其他民族相融合，所残留的只有语言而已”。^③虽然突厥民族早已不在，还有若干中亚和中东国家欲借助“突厥”之名推行泛突厥主义思想。目前讲突厥语的有28个国家和地区。很多人把讲突厥语的人群称为突厥民族，这是错误的。当前世界上有突厥语国家组织、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突厥语国家友谊与合作大会、突厥语世界司法家国际协会、突厥文化国际组织等。突厥民族虽然已经消亡，但泛突厥主义思想还在危害着相关国家的主权。

（2）土耳其人与土耳其民族

土耳其人：土耳其国家的主体人口，突厥人的一支，系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土耳其一词最早源于西方。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时代，欧洲人开始将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血统穆斯林所征服的安纳托利亚一带称作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人则是指分布于安纳托利亚高原和操突厥语的下层村民。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土耳其人则是指操土耳其语且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国民。

土耳其民族：本文所指的土耳其民族是土耳其共和国内所有民族的统称，是土耳其共和国民族建构的产物。在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凯末尔就对土耳其民族做出过界定。“首先，他确认土耳其民族的地理界线，强调坚持边界现实状况的国家观。其次，凯末尔认为，土耳其人是历史融合的产物，因此，国家政策应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境内居民不分信仰、语言、文化和种族，统统被称为

^① 潘志平主编《中亚的民族宗教冲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

^② 潘志平：《论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史学集刊》2004年第4期，第61页。

^③ 杨凌林：《浅析泛突厥主义》，《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3-4期，第67页。

土耳其人”。^①所以，土耳其民族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现代民族，是土耳其的国族。在本文中，为了便于区分，笔者将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民族称为突厥民族。只有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土耳其民族才能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出现。突厥民族与土耳其民族的关系是原生民族与次生民族的关系。土耳其民族是突厥民族的分支之一。虽然突厥民族已经消失，但泛突厥主义思想还时而泛起。随着原生民族突厥族的消失，次生民族土耳其民族已发展为成熟的民族。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已取代泛突厥主义。土耳其民族已成为世界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3）库尔德人与库尔德民族

库尔德人：生活于中东的古老人种之一，和土耳其人一样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库尔德语。库尔德人生活的地方被称作库尔德斯坦，其主要位于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四国交界处。库尔德人口大致为3000万左右。一战后，库尔德斯坦被分割到了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四国境内。从而，库尔德问题也成为影响四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库尔德民族：生活于中东地区的游牧民族，总人口约3000万。是继阿拉伯、土耳其和波斯的第四大民族。库尔德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其中大部分是逊尼派穆斯林，少数库尔德人信奉什叶派。虽然在中东地区生活了近千年，但库尔德民族并未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国家，因而，也被称为“没有国家的民族”。一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地缘版图的更迭给了库尔德民族良好的建国时机，但由于其自身原因和外部压力，最终痛失机遇。1923年的《洛桑和约》签署后，库尔德民族被划分到了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四国境内，成为四国内的少数民族。

（4）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

国家建构：指国家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建立国家制度为目的而实施的一系列相互促进、彼此联系的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现代化过程。包括国家官僚制度的建设、军队及警察制度的建设等等。

民族建构：指在国家疆域内进行的，旨在将境内所有民族整合为拥有共同政治文化特质的国族的过程。其目标在于打造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

（5）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

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1299-1923年），是一个多民族帝国，因创立者为奥斯曼一世而得名。穆罕默德二世时定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

^① 敏敬：《“凯末尔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关系探析》，《世界民族》2006年第6期，第16页。

尔。奥斯曼人原为一个突厥小部族，初居中亚，迁至小亚细亚后建立起庞大帝国。经过近百年的征服，相继兼并了安纳托利亚、巴尔干半岛、阿拉伯地区以及欧洲平原等地。16 世纪，奥斯曼帝国走向了巅峰时期，其领土跨越了欧、亚、非三大洲，雄踞于欧亚非大陆的中央一带，帝国的崛起就此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17 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渐趋衰落。18 世纪，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为了获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不断的对外扩张，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因而成了列强所觊觎的目标。1914 年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选择站在同盟国的一方。为了肢解奥斯曼帝国，英国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奥斯曼帝国后院起火。最终，奥斯曼帝国被肢解。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取代奥斯曼帝国，凯末尔废除了苏丹制度。

土耳其共和国：简称土耳其，是 1923 年由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土耳其是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西临爱琴海、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毗邻。其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土耳其以土耳其人为主，同时境内还生活着库尔德人、切尔克斯人、高加索人等少数民族。

（6）青年土耳其党

1889 年由奥斯曼的年轻人所创立的爱国组织。其最早源于 1887 年帝国医学院所创立的统一与进步协会，最初领导人是阿麦德·李萨。1889 年法国大革命 100 周年之际，阿尔巴尼亚裔的穆斯林易卜拉欣·特莫在伊斯坦布尔创立了激进派的反对派组织奥斯曼统一协会，宣传宪政思想。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迫害，协会成员被迫流亡海外，之后在热那亚和巴黎成立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该组织被西方人成为“青年土耳其党”。1909 年 4 月该党发动资产阶级革命上台执政，对内推行奥斯曼主义，镇压帝国内少数民族独立运动，对外与德国结盟。从 1909 年到一战爆发前，青年土耳其党一直控制着奥斯曼帝国的政权。

（7）凯末尔党人与共和人民党

凯末尔党人：以凯末尔为核心的团结在凯末尔周围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凯末尔党是共和人民党的前身。共和国成立后，共和人民党被称为凯末尔政党，其成员也可称为凯末尔党人。

共和人民党：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最长的政党。该党最早源于土耳其独立战争前夕锡瓦斯会议上成立的人民党。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党成了土耳其首个正式的政治组织。1924 年人民党更名为共和人民党。共和人

民党的建立标志着土耳其进入了一党制统治时期。1945 年民主党的建立终结了共和人民党的统治，土耳其进入了多党民主化时期。

第一章 库尔德民族主义缘起与早期发展

在从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共和国转变的过程中，土耳其库尔德政策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有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为此，笔者将在第一章中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奥斯曼帝国的库尔德政策进行分析。

第一节 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库尔德民族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末期，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但与之相对的则是西欧列强大肆对外进行殖民侵略和殖民扩张，对帝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下，帝国政府便开始以改革的方式救亡图存，一些有识之士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坦志麦特”运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又引入西方的先进思想。这样，随着“坦志麦特”运动的深入，西欧的民族主义思想便开始渗透到帝国内部，进而也影响到了库尔德地区。

一、乌贝杜拉起义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

19 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逐渐变得虚弱，这也导致帝国放松了对库尔德地区的控制。库尔德斯坦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乡村秩序变得混乱。这就为库尔德地区的新型领导力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19 世纪末期的乌贝杜拉起义表明谢赫作为新崛起的力量弥补了该地区的权力真空，同时，乌贝杜拉起义也表明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谢赫乌贝杜拉起义标志着库尔德民族主义意识增强的第一阶段”。^①虽然乌贝杜拉起义失败了，但是它也激励了越来越多的库尔德人开始追求自身的族裔身份。

乌贝杜拉起义是 19 世纪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起义，因为它标志着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起义发生于 1880 年，其原因在于 1877-78 年的俄土战争爆发于库尔德斯坦地区。此次战役导致了库尔德斯坦地区的人员伤亡和部落的分裂，以及一次大饥荒。不仅如此，由于帝国后期的财力枯竭无法给予士兵们薪饷，所以大批的奥斯曼士兵以及官员们，便开始掠夺库尔德人口，搜刮物资和金钱。1880 年忍无可忍的库尔德人在谢赫乌贝杜拉的带领下，在德西姆、马尔丹、哈卡里以及巴贝多等地发动了起义。同年，乌贝杜拉率领的起义军攻入波斯。乌贝

^① Robert Olson, *The Emergence of Kurdish Nationalism and The Sheikh Said Rebellion, 1880-1925*,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9, p.1.

杜拉以独立的库尔德斯坦的名义给英国驻大不里士的总督威廉·艾伯特写信，为其行动做辩护。他在信中说“库尔德民族是一个独立的人群，他们与其他人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们的法律和习俗也不同于其他人……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们想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处理我们国家的事情”。^①这封信表明他产生了一种库尔德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次起义的过程中，乌贝杜拉还宣称他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很显然，乌贝杜拉起义很符合安东尼·史密斯的族裔民族主义模型，因为“这些运动致力于从一个更大的政治单元中分离出来，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族裔民族”。^②所以可以认定乌贝杜拉起义有了民族主义的性质，乌贝杜拉起义则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开端。

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现代性

虽然乌贝杜拉的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也标志着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当时的库尔德民族主义仍旧处于萌芽阶段，没有任何的组织纲领和宣传媒体。乌贝杜拉宣称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但是他依旧对苏丹保有一定的忠诚。所以，当时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并未成熟。到了20世纪，库尔德民族主义有了新的变化，那就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组织纲领和宣传工具。而这些都是由19世纪末期首批具有现代化性质的库尔德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官僚机构的扩张和现代化需要不断壮大官僚、军官和官员队伍。这是通过建立现代国家教育体系实现的，这导致形成了一个熟悉欧洲语言、科学和文化的执政精英阶层。这个新的统治阶级由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奥斯曼穆斯林组成，其中包括许多库尔德人”。^③

首先，库尔德民族主义开始有了自己的宣传媒体。

最早的刊物是1898年米德哈特贝伊创建的第一份库尔德报纸《库尔德斯坦》报，这是份土耳其-库尔德双语报刊。《库尔德斯坦》报发表了关于库尔德语言和历史的文章，发表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诗歌。据称，它是奥斯曼帝国库尔德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问题态度的首次系统表达。虽然《库尔德斯坦》尚未提及民族分离，但他们经常将库尔德人与亚美尼亚人进行比较，以此来突出库尔德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简而言之，随着《库尔德斯坦》传播库尔德民族思想和文

^①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I.B.Tauris & Co.Ltd, 2007, p.53.

^②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enguin Books, 1991, p.82.

^③ Djene Rhys Bajalan, “The Kurdish Movement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1880–1923”, in Hamit Bozarslan, Gengiz Gunes and Veli Yadirgi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Kur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12.

化，1898 年的出版物可能被视为象征库尔德民族主义开始的事件。

1908 年“青年土耳其革命”后，另一份报刊即《库尔德自治互助公报》开始发行，由杰米尔贝任主编。该公报是首个合法的库尔德报纸，只关注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以及民族认同，所以在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人之间很受欢迎。1912 年，一小群学生（他们大多数就读于伊斯坦布尔农学院）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即“库尔德希望”。“该组织是由帝国议会成员卡尔哈桑领导的首个组织架构完备的政治组织，每一个未被流放或入狱的库尔德知识分子都是其成员”。^①1913 年该组织出版了以库尔德-土耳其语为主的报刊-《库尔德太阳报》。1914 年更名为《库尔德太阳》，该报刊致力于改革库尔德字母，宣传民族主义以及教化库尔德人民。这些报刊的出现，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平台，促进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

其次，库尔德民族主义开始有了政治组织和纲领。1908 年，青年土耳其党发动了革命并掌握了政权。1908 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恢复了宪政体制，不仅结束了专制主义，还复兴了 1876 年宪法。根据该宪法，具有不同宗教和民族身份的奥斯曼人是平等的公民。这加强了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社区对 1908 年革命的支持，推动了公共领域和出版领域的民族复兴。以至于帝国内几乎所有主要的民族和宗教团体都建立了自己的协会，并用自己的语言出版了报纸或期刊。库尔德人也加入了这股民族复兴浪潮。^②利用“青年土耳其之春”（1908-1913）这一相对自由的阶段，埃敏·阿里贝伊、谢里夫·帕夏以及谢赫·阿卜杜卡迪尔（乌贝杜拉之子，时任奥斯曼帝国的议员）建立了“库尔德斯坦复苏进步委员会（KTTC）”。它将许多有着不同想法和抱负的知识分子们团结到一起，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政治基础。同时，在库尔德斯坦的一些行省，如比特丽兹、迪亚巴克尔、慕斯、埃尔祖鲁姆以及摩苏尔等地，相继建立了多个政治俱乐部。此外，前文提到的“库尔德希望协会”是由库尔德学生创办的另一个新的组织。该组织成立后发行了《库尔德太阳》和《库尔德太阳报》代表库尔德人声音的报刊。不仅如此，该组织还致力于库尔德人的教育和文化权利。

与之前的组织相比，“库尔德希望协会”在某些方面较为激进，例如，他们将重点放在了土地改革，争取妇女权利以及字母表改革的问题上。“协会将库尔德社区的进步描述为‘库尔德青年的重任’。然而，即使对这些年轻的活动人士

^① Kendal, “The Kurds under the Ottoman Empire”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Olive Branch Press, 1993, p.26.

^② Mesut Yegen, “Kurdish Nationalism in Turkey: 1898-2018”, in Hamit Bozarslan, Gengiz Gunes and Veli Yadirgi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Kur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311.

来说，库尔德问题仍然是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问题”。^①此外，在一战结束的前一年，库尔德贵族们又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即“库尔德斯坦改善协会”。“协会的创始人与早期库尔德组织中著名的库尔德精英相同”，^②其中就包括赛义德·阿卜杜卡迪尔、艾敏阿里·贝迪尔可汗、哈密德帕夏以及赛义德·阿卜杜拉等。创立伊始，该组织便公布了其纲领“库尔德斯坦改善协会章程第一条规定，该协会的宗旨是确保库尔德人的总体福祉。第4条规定，政府的责任是致力于库尔德斯坦和库尔德人民的进步”。^③

总之，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和一战期间，库尔德人所创建的政治组织不仅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提供了组织架构，而且还提供了政治纲领。

相比于早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20世纪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有了自己的宣传工具和政治组织。此时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现代化，库尔德民族主义意识已初具雏形，为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三、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分离与被压制

一战以后，库尔德民族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出现了不同的流派。1918年《摩得洛司停战协定》签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战结束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那些忠于奥斯曼帝国的库尔德人最终接受了库尔德自治的思想。从而，那些在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文学家和贵族开始变为库尔德斯坦独立而奋斗的民族主义者。而对于库尔德人来说，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重组为他们提供了建国的最好时机。同年，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库尔德斯坦改善协会”建立，该组织致力于库尔德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争取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独立。

在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内部，围绕着建国问题却出现了分歧：由阿卜杜卡迪尔领导的传统主义者想要建立一个奥斯曼帝国治下的自治国；以年轻的库尔德军官为代表的激进派则想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虽然‘库尔德斯坦改善协会’主席赛义德·阿卜杜勒卡迪尔及其领导的团体主张库尔德人自治，但他们遭到副主席埃敏·阿里·贝迪尔汗及其追随者的反对，后者将为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奋斗”。^④“传统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导致了库尔德人之间

^① Djene Rhys Bajalan, “The Kurdish Movement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1880–1923”, in Hamit Bozarslan, Gengiz Gunes and Veli Yadirgi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Kur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12.

^② Hakan Ozoglu, *Kurdish Notables and the Ottoman State: Evolving Identities, Competing Loyalties, and Shifting Boundari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p.81.

^③ Hakan Ozoglu, *Kurdish Notables and the Ottoman State: Evolving Identities, Competing Loyalties, and Shifting Boundaries*, p.81.

^④ Mesut Yegen, “Kurdish Nationalism in Turkey, 1898–2018”, Hamit Bozarslan, Gengiz Gunes and Veli Y

出现了数十个党派和团体，领袖们的意见很难达成一致，内部纷争失去了建国的时机。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历史知识他们无法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①这样，由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内部意见分歧，导致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分裂。

一战后期英、法、美等战胜国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以维持当时世界格局的稳定，在三国的主导下，建立了由《色佛尔条约》、《圣日耳曼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组成的战后新的国际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维持现状政策所参照的历史时段往往是一场战争刚刚结束，力量的分配就是在这个时候的和平条约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做是因为和平条约的主要目的就是法律条文完成权力的转移，即战争胜负双方争夺的结果，从而通过法律规定来确保新的力量分配的稳定性”。^②由此可见，奥斯曼政府与协约国签订的《色佛尔条约》便成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构建未来中东国际格局的重要文献。条约签订后，土耳其部分领土被希腊、英国所占据。为了挽救国家的危机，以凯末尔为首的安卡拉政府发起了独立战争。

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凯末尔利用双方共同的信仰和亚美尼亚的威胁来说服库尔德人，以此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凯末尔主义者将奥斯曼主义者的政治话语转移，将他们的运动描述为一场寻求保护哈里发不受非穆斯林入侵者侵犯的运动。更具体地说，在东部，他们通过强烈反对亚美尼亚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领土主张，并强调他们绝不允许在穆斯林库尔德人的土地上建立亚美尼亚国，从而诉诸穆斯林的意見”。^③凯末尔以允许库尔德人自治为条件，将库尔德人团结在了自己周围。在库尔德人的帮助下，凯末尔击败了外来入侵者，捍卫了国家的独立。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却宣称要建立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家，从而开始打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由于当时的国际格局已经形成，对任何政治实体具有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库尔德地区也不例外。在当时权力格局之下，一旦新的民族国家建立，就被纳入到了国际体系之内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一员，那么其主权便不容侵犯。所以，对于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来说，对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打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为之后的民族矛盾埋下了伏笔。

在由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共和国转变的过程中，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使得

adiri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Kur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313.

^① Kendal, "The Kurds under the Ottoman Empire"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Olive Branch Press, 1993, p.30.

^②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lfred A. Knopf, 1948, p.22.

^③ Djene Rhys Bajalan, "The Kurdish Movement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1880-1923", Hamit Bozarslan, Gengiz Gunes and Veli Yadirgi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Kur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29.

帝国政府意识到了不断增长的民族意识给帝国带来的危机，从而开始实施相关政策以应对不断崛起的库尔德民族主义。

第二节 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库尔德政策

奥斯曼帝国从 13 世纪开始崛起于小亚半岛，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征服运动，在 16 世纪帝国达到极盛时期。将东欧、北非、阿拉伯、库尔德斯坦等地纳入到自己领土，逐渐成为一个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由于 1618-1648 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西欧列强为了维持当时的均势状态从而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拥有大部分领土的奥斯曼帝国也因此被纳入到了这一体系之中。18 世纪后期，由于帝国内部的腐朽以及西欧等国家的不断崛起，帝国逐渐走向虚弱。与之相反，西欧国家不断发展，1815 年第七次反法战争结束后，西欧列强之间为了维持当时的国际局势，遂建立了维也纳体系以取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奥斯曼帝国再一次被纳入到了维也纳体系之内，成为了西欧列强之间竞争的牺牲品。1914 年一战爆发，原来的维也纳国际体系被打破，奥斯曼帝国站到了同盟国一方。

1918 年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战败从而被协约国瓜分，存在了将近数个世纪的帝国走向解体，国际体系面临着新的重组进程。在这个进程之内 1920 年奥斯曼帝国政府与协约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土耳其人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1921 年凯末尔率领的土耳其国民军发动了土耳其独立战争，赶走了侵略者，保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协约国与土耳其签订了新的《洛桑和约》，不得不调整新建立的国际体系和中东政策。新签订的和约使得土耳其收回了大部分领土，土耳其重新获得了独立主权，这样一来中东格局形成，土耳其民族国家产生。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出现在了小亚半岛。1924 年土耳其政府颁布新的宪法，宣布废除苏丹哈里发制度，奥斯曼帝国正式灭亡。

以上论述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下面将回顾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库尔德政策。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政府也意识到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因而开始实施相关的政策以应对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一、哈米迪耶轻骑兵制度

由于民族主义发展并不成熟，没有达到建立民族主义国家的地步，乌贝杜拉起义以失败告终。虽然乌贝杜拉起义失败，但是它已经有了民族主义的性质，而

且此次起义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起义，影响了帝国边疆的稳定。因此，奥斯曼帝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维持边疆地区的稳定。

1882 年乌贝杜拉起义失败后，为了稳定边疆地带，苏丹哈密德二世创建了哈密迪耶轻骑兵制度，^①将库尔德人重新纳入到了帝国体系之内。

1891 年，苏丹哈密德授权在安纳托利亚的东部地区建立了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非正规组织-哈密迪耶轻骑兵制度。该制度效仿了俄国的哥萨克骑兵制度。哈密迪耶骑兵的主要兵员来源于逊尼派库尔德部落，每个兵团 600 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兵团仅仅由一个库尔德部落的成员组合而成。兵团的主要首领则是各个库尔德部落的领袖。当然，如果部落组织和规模较小，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军团的时候，每个部落就可以向军团提供一个中队。对于加入到哈密迪耶骑兵制的每一个部落民众，都可以享有免纳税的权利。对于每个部落领袖来说，他们将要被送往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学校去进行培训。除此之外，骑兵首领们还可以将自己的子女送往伊斯坦布尔和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学校接受教育。帝国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将他们的子女纳入到帝国的体系之下。不仅哈密迪耶里的军官和士兵可以享有以上待遇，而且帝国政府也在每个哈密迪耶村庄设立学校以满足库尔德人的教育需求。所以，对于每一个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部落来说，哈密迪耶制度很有吸引力。

苏丹哈密德的哈密迪耶骑兵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自由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而进入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成了当时维也纳体系的主导力量。不断发展的欧洲列强，为了获得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就需要不断地对外殖民。具有优越地缘政治环境的奥斯曼帝国成了西欧各国争夺的主要目标。

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帝国主义形成主要有三个诱因，分别是战争的胜利，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家的虚弱。“另一个形成帝国主义政策的典型环境是弱国或政治权利真空的存在，它吸引并可以使一个强国轻易进入。这是一个产生殖民帝国主义的环境”。^②所以，奥斯曼帝国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自身的虚弱，为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各帝国主义国家

^① 哈密迪耶骑兵制创建于 1890 年，是由奥斯曼帝国苏丹哈密德二世联合密友阿基尔帕夏和元帅择基帕夏联合建立。哈密迪耶骑兵制以俄国的哥萨克骑兵旅为蓝本，是一只由库尔德部落所组建的非正规民兵。其目的在于将帝国边境的库尔德部落整合到国家之中，并利用库尔德人镇压亚美尼亚人反抗，以此来巩固帝国的边境的领土。

^②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lfred A. Knopf, 1948, p.36.

以军事、经济和文化输出等不同的形式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控制。这就使得西欧国家的诸如民族主义等先进思想传入到了奥斯曼帝国，而库尔德民族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建立自治国的愿望，从而威胁到了帝国边疆的稳定。所以，为了维护边疆的稳定，苏丹哈密德建立了哈密迪耶制度将库尔德人纳入到帝国体系之内。

哈密迪耶的建立，不仅使得帝国在边境地区设立了一个堡垒，阻挡了俄国的入侵，而且通过在哈密德村庄地区建立学校，使得大多数库尔德人接受到了帝国教育。哈密迪耶在捍卫了帝国稳定的同时，也将库尔德人纳入到了帝国的体系之内。被纳入到帝国体系内部的库尔德人却被用做工具，屠杀亚美尼亚人。因为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受到了来自政府、库尔德人以及城市穆斯林等各方面的剥削与压迫。亚美尼亚人开始反抗，直到1890年代亚美尼亚人的问题变得越加严重。为了应对境内亚美尼亚人的反抗，帝国政府开始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库尔德人来对付亚美尼亚人。于是，库尔德人成了苏丹政府镇压亚美尼亚人的工具。帝国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仅给亚美尼亚人带来了痛苦，而且也使得库尔德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更不利于境内各民族之间建立睦邻关系。这也是哈密迪耶制度中的不理性因素。所以，总体来看，哈密迪耶制度维系了帝国稳定与生存，但该制度却成了苏丹政府的镇压工具，也加剧了境内各民族间的矛盾，因而又具有一定的负面因素。

二、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库尔德政策

1887年，帝国医学院的6名学生首创“统一与进步协会”。1889年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之际，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易卜拉欣·特莫在伊斯坦布尔发起创立激进的反对派政治组织“奥斯曼统一协会”，秘密宣传宪政思想。此后，由于苏丹政府的迫害，奥斯曼统一协会的许多成员流亡国外，继而在热那亚和巴黎成立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西方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推翻了苏丹哈密德二世的统治，建立了宪政政府。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权以后，放松了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控制。宽松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使得国内的思想界十分活跃。借助这一段自由时期，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兴办了自己的报刊，库尔德民族主义开始有了一定的现代性。

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们开始追求库尔德斯坦地区的自治。“摩苏尔东北部，巴赞的谢赫·阿卜杜萨拉姆和杜胡克的努尔穆罕默德组织了一次请愿。他们要求在行政和教育方面任命库尔德人，任命讲库尔德语的官员，设立沙利亚法的学校以

及根据伊斯兰教法执行法律，最后也要根据沙利亚法来收税……”。^①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意识开始渗透到库尔德斯坦的偏远地区。“1913 年春，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势力不断壮大”。^②这时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对于奉行奥斯曼主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已是一个威胁。他们开始打压库尔德民族主义。“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排斥非土耳其知识分子，开始了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冒险。所有非土耳其人的学校、团体、出版物均被禁止，他们的领袖也被投入监狱或被处死。库尔德团体、公报、学校以及库尔德俱乐部都属于其范围之内”。^③

可见，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期间，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前期，实行了宽松的文化环境政策，库尔德民族主义有了新的发展；但在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后期，政府开始意识到了库尔德民族主义扩大对其奉行的奥斯曼主义构成了威胁，因而开始打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

总体来看，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帝国政府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帝国分裂，维系了帝国的完整性，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 1618 至 1648 年“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西欧强国之间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该体系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了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关系中独立对外交往的平等权，开创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的国际体系。1815 年维也纳体系的建立取代了原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并未破坏其中的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国家依旧是维也纳体系内重要的国际行为体。虽然 19 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不断衰落，但仍是一个主权国家，有权捍卫自身权利。帝国境内的库尔德人起义是对奥斯曼帝国国家主权的挑战，因而帝国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库尔德民族运动进行限制，以维护自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对库尔德人来说，帝国政府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库尔德民族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利益，也剥夺了库尔德人建国的机会。

三、独立战争期间的库尔德政策

1908 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上台，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站到了同盟国一方，1918 战争以奥斯曼帝国战败结束。帝国与协约国之间签订了《摩得洛司停战协定》。一战结束后，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在 1919-1922 年期间确立了新的国际权力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重组了国际秩序。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对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实行了一项新的瓜分制度即委任统治，重新

^①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I.B.Taris & Co.Ltd, 2007, p. 98.

^②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99.

^③ Kendal, "The Kurds under the Ottoman Empire",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Olive Branch Press, 1993, p.26.

确立了对奥斯曼地区的控制。在这一国际关系体系之下，协约国与帝国政府签订了《色佛尔条约》，帝国的大部分领土被协约国瓜分。不仅如此，该条约也承认了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的建立。面对协约国对奥斯曼领土的瓜分，爱国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最终带领人们发起了独立战争，赶走了侵略者，建立了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

土耳其独立战争中，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凯末尔策略地对库尔德人采取怀柔政策。“他呼吁所有穆斯林成员联合起来共同赶走穆斯林国土上的外国侵略者。凯末尔并没有提到土耳其国家的概念，相反他强调的则是库尔德人和土耳其或奥斯曼国家之间的联合”。^①为此，凯末尔以允许库尔德人自治为条件，将库尔德人团结在自身麾下。凯末尔团结库尔德人的政策受到了大多数库尔德部落的支持。随着战争逐渐走向胜利，其对库尔德人的政策开始转变。他们开始对库尔德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打压，众多库尔德协会和组织被取缔，库尔德俱乐部也被关闭。独立战争结束之时，库尔德人发现他们没有了组织力量，惟一军队也被控制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手里。1922年11月1日，在战争胜利三个月后，凯末尔在大会宣布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土耳其国家。由于库尔德人缺乏远见以及缺乏政治领导，建立库尔德国家的梦想再一次落空。而这一时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也受到了凯末尔主义的压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因而处于停滞状态。

以上论述讨论了独立战争时期土耳其库尔德政策，接下来就要结合当时的国际局势，从历史的视角对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库尔德政策做一下评析。

在奥斯曼帝国末期，国际秩序重组，英法伙同希腊入侵土耳其，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奥斯曼帝国解体。这时的突厥人与库尔德人都有利用民族自决权原则建立国家的权利，但最终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击败了英希联军对土耳其的侵略先于库尔德人建立了民族国家，所以库尔德人就丧失了建国权利。因为按照主权原则，土耳其已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库尔德人没有建立起来，沦为土耳其国家内的少数民族。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并得到国际承认，那么库尔德人就失去了利用民族自决权建国的权利。这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不利于土耳其国家的建构，并对土耳其的国家主权造成威胁。在土耳其国家建构与库尔德人的国家建构之间的竞争中，土耳其共和国优先建立，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库尔德建国的权利。库尔德人只能在土耳其共和国内争取民族自治了。

库尔德人与突厥人在利用民族自决权建国的竞赛中，由于突厥民族自身的民

^① Kendal, "Kurds in Turkey",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Olive Branch Press, 1993, p. 46.

族主义理论达到了一定的成熟程度，而且突厥人也抓住了建国的有利时机，率先建立了主权国家，成为了国际体系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体系中，国家主权高于一切是不可撼动的，所以土耳其国家的库尔德政策在捍卫了国家主权的同时也捍卫了当时国际体系的稳定。

错误的是新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强调单一的突厥民族属性，而且对库尔德民族进行强行同化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突厥与库尔德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阻碍了土耳其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民族认同的塑造，也为后来国内库尔德问题的尖锐化埋下了种子。

在以上内容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讨论了从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共和国转型的过程中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对土耳其国家所采取的库尔德政策做了简略的评析。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分析战后条约中库尔德自治国的出现和失败的原因。

第三节 一战后条约中的库尔德自治国

在从帝国向共和国转变的过程中，库尔德民族主义虽然受到了压制与排挤，但是在一战后期，库尔德民族主义迎来了一次高潮，那就是一战后奥斯曼苏丹政府与协约国签订的《色佛尔条约》。这个条约将库尔德斯坦地区划为相对独立的自治国。这是对奥斯曼帝国主权的践踏，同时也是库尔德人迎来建国的绝佳机会。

一、《色佛尔条约》与库尔德自治国的构想

1920年《色佛尔条约》签订，条约以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为基础探讨了库尔德自治国的建立问题。其中条约的第62-64条就涉及到了独立的库尔德斯坦的问题。

“第62条：有英法意三国政府任命的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委员会，在六个月后实现该和约，在幼发拉底河东部，即将建立的亚美尼亚国家边境的南部以及土耳其、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之间边境的北部建立一个库尔德自治区。

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将把它交于各自政府。该计划必须保障亚述-迦勒底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或宗教的权利。为此，一个由英、法、意、波斯以及库尔德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将访问该地区，以决定对土耳其边界做何调整。

63条：奥斯曼政府同意在接受到第62条通知后的三个月内执行该决定。

64条：一年后如果该地区的库尔德人向国联建议并说明在该地区的广大人口希望独立，如果国联进行评估后认为可以独立，那么土耳其政府就要放弃对该

地区的所有权利，其细节要由土耳其与协约国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监督。在土耳其弃权后，协约国不得干涉居住在摩苏尔地区的库尔德人寻求其成为库尔德国家的公民权利”。^①

《色佛尔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库尔德民族主义达到了最高峰。从条约内容上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的领土减少了三分之二，其丢失的领土大多是一些肥沃地区以及传统的地带但并不包括伊朗库尔德斯坦。缩小了的国家只剩下了一些贫困地区其中包括了哈尔普特、德辛、哈卡里以及希尔特。迪亚巴克尔变成了其首都，维拉耶特则是其经济中心。条约生效后库尔德斯坦地区被分为五个部分，仅于中部地区留下了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虽然独立的库尔德斯坦丧失了大部分领土，但对于库尔德民族来说却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因为“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这仍然是一个明确的国际承认，即库尔德斯坦至少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国家。”^②《色佛尔条约》的签订为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的建立提供了国际性文件，也为库尔德人追寻其自身合法权利提供了依据。所以，该条约标志着库尔德民族主义进入到了高潮，后来取代《色佛尔条约》的《洛桑和约》的签订却使得独立的库尔德自治国的梦想破灭。

二、《洛桑和约》与库尔德自治国的“流产”

虽然《色佛尔条约》的签订为独立的库尔德自治国的建立提供了基础，但是该条约也使得原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丧失殆尽。所以，以凯末尔为首的安卡拉政府拒绝承认条约中的条款。为了捍卫领土与主权，凯末尔与库尔德人结盟，共同抗击外国侵略者。1922年8月，在凯末尔的领导下，民族主义者们发起了反攻，夺得了屈塔希亚、布尔萨和伊兹密尔等地，收复了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东部地区。迫于压力，协约国接受了停战协定，同意废除《色佛尔条约》。协约国与凯末尔政府于11月在瑞士的洛桑重新签订新的条约以取代《色佛尔条约》。

1923年7月，土耳其政府与协约国在瑞士洛桑签署了《洛桑和约》。该条约将大部分库尔德斯坦的领土划归给了土耳其，但条约中并未提及到库尔德斯坦的自治问题，也没有保障他们的权利。条约仅仅提到了“保护少数民族”。

“无论是在集会、宗教活动、印刷、以及商业活动和私人事务，任何土耳其公民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尽管存在官方语言，但是土耳其内部的非土耳其语公

^① Kendal, “Kurdsitan in Turkey”,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Olive Branch Press, 1993, p.33.

^② Djene Rhys Bajalan,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Question of Kurdish Statehood: A ‘Missed’ Opportunity?”, *Ethnopolitics*, Vol.18, No.1(2019), p.17.

民可以使用其自身的语言。土耳其议会要认真执行第 38-44 条款，确保任何法律规定和官方行动都不会与这些规定相矛盾或对立，任何法律以及条例或官方行动都不会违反这些规定”。^①

《洛桑和约》的签订虽然捍卫了土耳其的领土与主权，但对于库尔德人来说，他们失去了独立建国的可能性。条约签订后库尔德斯坦地区被划分到了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国内，这是对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第二次瓜分。这样一来，库尔德斯坦地区被分为了四个部分，库尔德自治国最终流产。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否定了库尔德人的建国权利，根据主权原则与强权原则，土耳其收回库尔德人的建国权是符合国际法的。根据主权原则，国际体系内的主要成员国是主权国家，主权高于一切。既然凯末尔建立了民族国家，那么他就可以行使国家主权。根据主权原则与强权原则，土耳其可以否定库尔德人的建国权。其次，凯末尔粉粹了英法列强瓜分国家的企图，捍卫了国家主权。按照当时的强权原则，他迫使英法签署新的《洛桑条约》以取代《色佛尔条约》是符合当时的强权原则与国际公约的。如此看来，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取消了库尔德人的建国权，无论是从国际体系还是从国家主权原则来看，其行为符合当时的国际公约，所以具有合理性。

三、库尔德人建国失败的原因

尽管《色佛尔条约》为库尔德人建国提供了一个合法性的国际文件，而且当时也出现了建国的绝佳机会，但是，最终库尔德人还是没能够抓住这一次建国机会。笔者认为，库尔德人建国失败的原因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

其内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裂，这是库尔德难以建国的主要原因。《色佛尔条约》的签订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为库尔德人建国提供了一个绝佳时机，但他们并未抓住这个良好时机，反而在关于建国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这是导致库尔德自治国流产的一大原因。其次在于当时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们未能培育出广大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库尔德人的民族特性不明显。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标志着成员间的联系纽带”。^②因此，在民族认同的作用下，民族内部的成员不断努力，团结成为一个整体，但对于当时的库尔德人来说，他们就连最基本的民族认同都尚未形成。

从当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情况来看，只有库尔德青年与当时的旧贵族具有民族主义精神，而在广大的库尔德乡村地区，大多数库尔德人并未形成一个完

^① Kendal, "Kurdistan in Turkey",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Olive Branch Press, 1993, p.46.

^②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enguin Books, 1991, p.15.

整的库尔德民族认同。因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们很难发动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和起义以争取民族独立。最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缺乏有力的组织纲领和完善的领导机构。“纵观 1919 至 1923 年间的中东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产生了现代史上第一个比较正式的民族主义组织‘库尔德斯坦进步协会’，但实际上该组织并没有领导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实力，不具有代表性”。^①而且在该时期，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们也没有提出一个能够获得库尔德人支持的纲领。在这些内部因素的影响下，库尔德建国梦化为泡影。

外部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首先，从国际体系层面上来看。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种新的均势体系，世界处于多极格局之下。在这种格局之下，各列强都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加大了对中东的控制力度。特别是在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问题上，英、法、希等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利用库尔德人与突厥人之间的矛盾对奥斯曼帝国领土进行瓜分。英国为了得到摩苏尔地区的领土，便与库尔德人进行合作宣称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建国，但在达到自身的目的后却抛弃了库尔德人。而美国为了进一步染指中东，提出了“十四点原则”，其目的是为了限制英法在中东的行动以及争夺中东地区的利益。同时，该原则也挑起了库尔德人与突厥人之间的矛盾。可见，在英美两国角逐中东利益的过程中，库尔德人成了他们的棋子。因而，由于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外部势力的影响，库尔德人的建国梦最终落空。

其次，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这使得库尔德民族的建国权被否定，库尔德民族主义再次受到了打压。在这一外部因素的作用下，库尔德自治国流产。

总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由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共和国转变之际，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乌贝杜拉起义标志着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虽然该阶段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尚不成熟，但是却标志着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开始。在这种原初的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库尔德人开始追寻他们的族裔认同。第二阶段则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化，有了自己的宣传工具和政治组织。库尔德民族主义开始步入到了政治民族主义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分裂与被压制。在即将获得独立之际，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产生了分歧，激进的一方支持完全独立，而保守的一方则支持帝国下的自治，这也导致库尔德人错过了建国的最好时机。土耳其独立战

^① 杨玉龙：《现代中东库尔德政党研究：起源、嬗变和现实》，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第 60 页。

争期间。凯末尔政府将库尔德人团结到了凯末尔主义之下，但在胜利后，土耳其政府却对库尔德民族主义进行了大肆打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因而陷入了沉寂。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该共和国成为国际体系内的一员。同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一样，土耳其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就面对着如何处理国内少数民族这一问题。因为，在土耳其共和国除了突厥人之外，其东南部地区还有着为数众多的库尔德人，他们占到了土耳其总人口的 20% 左右。因而，如何将国内库尔德民族整合到国家建构过程中，就成了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主要问题。在共和国初期的国家建构中，凯末尔一心想要将土耳其打造成西方式的现代化国家。在解决库尔德问题时，由于凯末尔的急于求成，最终对库尔德人采取强行同化政策。在此政策下，国家对库尔德人采取了诸如语言同化、强制迁移、军事管制以及身份否定等严厉措施。同化政策非但没有成功将库尔德人纳入到国家建构之中，反而使得库尔德民族主义愈发激进化，给国家带来了安全威胁。在土耳其库尔德政策的制定上，国际关系的变动、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及民族主义思想都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上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库尔德政策做了回顾，同时也对库尔德民族建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下面笔者将从国际关系、国家建构以及民族主义三个视角对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库尔德政策进行评析。

第二章 土耳其库尔德民族政策的国际关系视角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土耳其已经成为了主权国家国际体系内的一员。因而，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政策也与当时的国际体系有着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是伴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化而发展的。因此，本章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对土耳其库尔德政策做出评析。

第一节 一战后列强构建的国际体系与中东格局

在由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共和国转型的过程中，国际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维也纳体系变成了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土耳其库尔德政策与国际体系的变动之间有着重要关联。下面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以欧洲为中心的两次国际体系的演变，及其对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影响。

1803-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法、俄、普、奥等欧洲列强建立了一个以均势和补偿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体系即维也纳体系。作为当时主导欧洲的主要国际体系，维也纳体系属于一个多极格局体系。在这个多极格局之内，列强之间相互牵制。正如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肯尼斯·华尔思所指出的那样“在多极系统中，强国如此之多，以至于任何一国都无法清晰而固定地区分盟友和对手；而强国的数量又不够多，以至于任何一国的变节所造成的影响都不可能是无足轻重的”。^①所以，这一多极体系所造成的后果便是各列强之间势均力敌。因而在面对奥斯曼帝国这一巨大的政治遗产时，他们之间谁也不想让对方占据更多的利益，而且各列强之间谁也无法承担帝国解体之后所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后果。

正是这一多极权力格局的存在，才使得列强之间在处理奥斯曼帝国的问题时各行其是，各怀鬼胎。因为他们都担心对方获得更多的利益。由此，奥斯曼帝国的存在，竟然成了各列强之间力量平衡的杠杆。所以当时国际体系内列强间的博弈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得以延续下来。当然，这一体系也给帝国境内的突厥人与库尔德人带来了影响。虽然维也纳体系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存续，但也依旧改变不了其行将灭亡的命运。在这一体系下，各列强纷纷以各种方式来对帝国施加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168.

影响以增加自身利益。所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思想上，帝国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对突厥人和库尔德人影响最深的则是民族主义。

19 世纪末期，随着列强对帝国干预加深，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随之传入。在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以前，突厥人与库尔德人都生活在帝国的宗教制度“米勒特制”之下，该制度将宗教作为人们的身份象征。在这一制度之下，帝国境内各族人民地位平等，尚未形成自身的民族认同。19 世纪末期，随着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流的不断加深，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也随之传入帝国境内。民族主义的出现，使得境内的突厥人与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开始强化自己的民族特性，形成了民族认同，发展出了各自的民族主义。无论对于突厥人还是库尔德人，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尚未达到成熟阶段，因而，二者依旧存在于帝国的米勒特制度之下。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站在了同盟国一方。这一选择给此后的帝国命运带来了毁灭性结果。1815 年西欧列强在第七次反法战争胜利后，建立了以均势、补偿原则为基础的维也纳体系。在这一国际体系之下，列强间形成了一种均势格局，“一些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他们或是维护现状，或者试图颠覆现状—必定会导致一种成为‘均势’的结构以及以维持均势为目标的政策”。^①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成了西方列强垂涎的对象。在这种均势格局之下，由于列强间谁也无法单独承担这一庞大帝国解体所带来的后果与风险。因而，这种均势体系也使得奥斯曼帝国获得了喘息之机。

一战爆发后，由于奥斯曼帝国的错误选择，进而使得英国开始对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英国的殖民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停地进行分裂：在奥斯曼帝国的全境制造分裂，以削弱帝国与英国的作战能力。所以，这一政策的目标在于从内部瓦解奥斯曼帝国。在这一政策下，英国煽动阿拉伯民族大起义，使得奥斯曼帝国“后院起火”同时还煽动库尔德人闹独立，协助突厥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给此后中东各民族间的矛盾埋下伏笔。在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之下，奥斯曼帝国最终被肢解，而中东地缘版图渐驱破碎化。最终，1918 年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间签署了《摩得洛司停战协定》，奥斯曼帝国战败。战后，为了重塑世界秩序以及瓜分胜利果实，战胜国建立了新的国际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取代了原有的维也纳体系。

^①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lfred A. Knopf, 1948, p.125.

“相比于此前的维也纳国际体系，凡尔赛体系中列强数量明显减少（特别是针对中东地区），因此外部大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和控制力度比过去明显加大。尽管凡尔赛体系仅持续了 20 年，但受这一国际权力体系的影响，外部大国对中东秩序的塑造和重组是颠覆性的”。^①国际体系的变动，为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独立建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在这一权力体系之下，英法等国都加大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与影响。“当然，胜利的帝国—英国和法国，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在重塑地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②一战期间，英国直接利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将帝国境内的阿拉伯、亚美尼亚与库尔德等各个民族分裂出去以肢解奥斯曼帝国，从而更好地控制该地区，以将其纳入到自身的殖民统治体系之下。在英国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之下，帝国治下的民族掀起了民族独立浪潮。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后，英国又利用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制度对帝国进行瓜分。这一制度使原来的帝国版图变得更加破碎。而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俄国革命家列宁所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原则更为帝国境内各民族的独立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无论是列宁式的还是威尔逊式的民族自决原则，都在塑造后奥斯曼时代的殖民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在巴黎的和平缔造者面前显得格外突出。事实上，威尔逊明确承认国家自决原则适用于中东局势”。^③突厥人与库尔德人也正是利用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作为其建国的重要依据。在“民族自决权”影响下，突厥人与库尔德人都开始了自身的建国历程。

总之，国际体系的变动给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库尔德民族等少数民族提供了绝佳的建国时机。一方面，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使得中东原有的地缘版图破碎化，为突厥人和库尔德人提供了建国的空间。因为，一战之后由于美国重回孤立主义、奥匈帝国解体、德国战败以及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这就使得英法成了重塑中东秩序的主要执行者。这一结果便是外部力量对中东的干预力度明显加大。为了实现对奥斯曼帝国遗产的瓜分，英法对其实行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下，奥斯曼帝国内部掀起了民族独立浪潮。而这一政策的结果便是加速了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使伊斯兰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① 田文林：《国际权力体系的三大变迁对中东的影响》，《国别与区域研究》2020 年 2 月第 1 期，第 20 页。

^② Djene Rhys Bajalan,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Question of Kurdish Statehood: A ‘Missed’ Opportunity?”, *Ethnopolitics*, Vol.18, No.1 (2019), p.14.

^③ Djene Rhys Bajalan,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Question of Kurdish Statehood: A ‘Missed’ Opportunity?”, p.14.

与无序状态，并葬送了阿拉伯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梦想”。^①同时，这种破碎化的地缘版图也为突厥人和库尔德人提供了建国空间。在战后，英法的“委任统治”制度使得中东版图愈加破碎化。在“委任统治”制度之下，整个中东地区被划分为了两大政治区域即北层政治区域和南层政治区域。其中北层政治区域包括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南层政治区包括新月地带和阿拉比亚地带。英法的“委任统治”为中东人为地构建出了“主权国家体系”，这样一来就大致确定了一战后中东民族国家的疆域与版图。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威尔逊于 1918 年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原则。“1918 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巴黎和会提交了‘十四点原则’作为重建世界秩序的蓝本，民族自决权是‘十四点原则’的重要基础之一”。^②威尔逊“民族自决权”理论的提出，为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库尔德人和突厥人提供了建国理论依据。

第二节 一战后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与民族自决理论

1918 年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建立了新的国际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取代了原来的维也纳体系。国际体系的变动为奥斯曼帝国境内突厥人和库尔德人提供了良好的建国时机。而在同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更是为突厥人和库尔德人建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民族自决原则的指引下，二者展开了建立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国家的竞赛。

1918 年一战结束后，德国战败、沙俄政府被推翻、美国重回孤立主义，因此英法成为了中东地区的主导者。虽然美国回到了孤立主义，但为了削弱英法在中东的力量以及推行其“门户开放”原则。美国总统威尔逊于 1918 年提出了构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原则”，而民族自决权成为“十四点原则”的重要基础之一。“十四点原则”中主要涉及到民族自决原则的内容有“解决一切殖民地纠纷时，须以诚相见，绝对公正，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的问题时，应当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与殖民政府之正当要求……承认奥斯曼帝国土耳其部分之主权，但土耳其统治下的其他各民族应获得绝对的自治权……必须根据旨在不分大小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保证的专门盟约，组织一个普遍的联合机构”。^③不难看出，威尔逊民族自决权的提出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

^① 田文林：《英国在中东分而治之的政策及其后果》，《西亚非洲》2020 年第 3 期，第 61 页。

^② 李娟：《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之间关系的嬗变》，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年，第 7 页。

^③ 邓蜀生：《伍德罗·威尔逊》转引自蔡珊珊《列宁与威尔逊民族自决思想的比较》，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16 页。

首先，这一原则的提出完全有利于美国成为世界大国这一战略要求。“该战略要求美国不断削弱欧洲列强的实力，逐步将他们从广大殖民地上排挤出去”。^①其次，也是与沙俄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最后也是为新殖民政策做铺垫。但无论如何，威尔逊民族自决思想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为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建立民族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民族自决权”理论最早起源于西欧，与启蒙运动密不可分。当时，资产阶级逐渐兴起，而封建王权与宗教神权则成了其最大的阻碍。为了战胜封建王权与宗教神权，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自由、平等思想，鼓励欧洲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实行自治，建立民族国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将自决权作为理论武器，最终推翻了封建王权，而民族自决权也在法国大革命中首次得到实现。因此法国大革命期间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首次成为了国际关系原则之一。之后，民族自决思想传入美洲，美国的独立战争便是民族自决思想在北美的实践。最终，在民族自决思想的引领下，西欧、北美建立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英语民族国家体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步入了帝国主义时期，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本市场以及原料产地，将亚非拉等多个国家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由于西欧列强间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不平衡，新老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频起，导致一战爆发。1918年一战结束后，世界上开启了第一波反殖民化浪潮。1918年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原则”其中就包含了民族自决思想，威尔逊民族自决思想的要点在于承认了奥斯曼帝国及奥匈帝国治下的各民族有民族自决权。与此同时，列宁也对这一原则做出了阐释，列宁将世界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列宁民族自决权的核心在于强调民族脱离异族国家，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可见，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意味着政治分离权，即鼓励被压迫民族从政治上与压迫民族相分离。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在世界上广为传播，成为二战以后推动广大亚非拉国家走向独立的重要原则。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众多民族，尤其是突厥民族和库尔德民族来说，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则更为适用。因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著名的‘十四点原则’明确呼吁‘现在要确保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民族生命的安全和绝对不受干扰的自主发展机会’”。^②

^① 孙建中：《论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权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40页。

^② Djene Rhys Bajalan, “The Kurdish Movement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1880–1923”, Hamit Bozarslan, Gengiz Gunes and Veli Yadirgi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Kur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26.

从民族自决权的产生至一战后的发展来看,民族自决理论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成为国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虽然有争议,但其权利内容已基本明确,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民族独立权、自由分离权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是一种集体权利”。^①至此,我们可以给民族自决权定义为:世界上的各民族都有在不受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决定其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权利。民族自决权的提出为一战后亚非拉国家的广大殖民地人民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持。

民族自决原则,作为一项集体权利就要有其适用主体,但世界上存在着数千民族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能适用这一权利。迄今为止,国内外关于民族的定义并未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资本主义印刷工业的产物。民族学家盖尔纳认为民族是工业化进程的产物;而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是民族主义的产物。上述观点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关于民族的定义,但总的来看他们认为民族是现代化工业所建构的产物。这种观点忽视了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而族裔-象征主义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则抓住了这一关键问题,他从历史的角度将人类共同体分为民族和族群两种类型。在他看来,民族“是一个被命名的人口总体,他的成员共享一块领土,拥有共同的神话、历史记忆和大众性公共文化,共存于同一个经济体系,共享一套对所有成员都适用的一般性法律权利与义务”。^②他也指出了族群的六个特征即“一个集体性的适当名称;一个关于共同祖先的神话;共享的历史记忆;一个或多个不同的文化要素;与一个具体的祖先拥有的土地的联系;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间存在团结感”。^③

从以上关于民族与族群的定义来看,族群是民族形成的基础和核心。此外,安东尼·史密斯还曾强调每一个国家都建立于族群基础之上。“如果不参考这些早期的民族关系和记忆,就无法理解现代政治民族主义。我并不断言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建立在某种族群关系基础上,但许多这样的国家都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④对于当时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民族和库尔德民族来说,尚且处于族群阶段,因而二者都有利用民族自决原则建立国家的权利。对于突厥民族来说,由于其已经建立了奥斯曼国家,因而是真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一战的爆发

^① 王建廷、莫非:《民族自决权的内涵及其演变》,《社科纵横》2006年第5期,第75页。

^②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enguin Books, 1991, p.14.

^③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14.

^④ Anthony Smith, "Opening Statement: Nations and Their Pasts". *Nation and Nationalism*, Vol.2, No.3(1996), p.361.

肢解了奥斯曼帝国，所以突厥民族的任务便是重组国家。所以，本质上来讲，一战后的突厥民族是“复国”的问题，而库尔德民族是建国问题。因而，在一战后国际体系重组的过程中，突厥民族获得了“复国权利”，库尔德民族则获得了建国权利。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的提出为库尔德人建国和突厥人“复国”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为此二者展开了一场比拼建国速度的竞赛。谁能抓住机会，谁首先建立国家或者恢复国家，谁就首先成为战后国际体系中的一员，享受主权国家拥有的权利；没有抓住机会的一方，则无法建立起国家，就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有可能沦为别人构建国家的牺牲品。库尔德人后来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节 突厥民族与库尔德民族展开了组建国家的竞争

国际格局的变动以及中东地缘版图的破碎化给库尔德人和突厥人创造了良好的建国时机与复国的空间。1918年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提出为二者的建国与复国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在此基础上，突厥人和库尔德人展开了创建国家的竞赛。1918年一战结束，战胜国为了重塑国际秩序和瓜分胜利果实，进而创立了以一系列条约所构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这一体系下，战胜国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签署了《色佛尔条约》。

在条约签署之后，协约国对安纳托利亚形成包围之势，英、法、意及希腊对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展开了争夺。同时，奥斯曼帝国内的工业、农业、运输业等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奥斯曼帝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因而，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成为突厥民族的重要任务。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发起了独立战争。独立战争期间，民族主义者号召团结一切力量，一致对外。而此时占全国人口20%的库尔德人则成为了凯末尔所团结的重要对象。

1919年，民族独立运动最高领导机构大国民议会在埃尔祖鲁姆召开，会上有54名代表来自埃尔祖鲁姆、比特丽兹、凡、以及埃尔津詹等库尔德省份。会后，凯末尔专门给库尔德部落领袖写信或发电报来获得库尔德部落领袖们的支持，在信中凯末尔还特别强调了突厥人和库尔德人的共同的宗教情感，称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凯末尔极力争取各派支持，在访问阿拉维派的库尔德村庄时，他绝口不提逊尼派拥戴的哈里发，而只引用阿拉维派的教义。在迪亚尔巴克尔的突厥人与库尔德人大会上，他重申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是土耳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承诺如果库尔德人提供军事支持，政府将允许他们自治”。^①

^①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

在凯末尔的这种统一战线的思想下，大多数库尔德人对此表示支持。无数普普通通的库尔德人涌入战场，为了国家的独立而奋斗。最终，1923年凯末尔领导的独立战争获得了胜利，协约国被迫与土耳其签署了《洛桑和约》取代了原来的《色佛尔条约》。“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的‘民族主义者’运动，成功地抵制了在1920年4月《色佛尔条约》中正式确立的分治方案。成功确保了土耳其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出现，并确保了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能够维持相对于欧洲大国的主权和独立”。^①《洛桑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新土耳其国家的诞生。

库尔德民族的情况与突厥民族的情况正好相反。对于库尔德民族来说，《色佛尔条约》的签订为他们提供了建国的法律文件。因为，《色佛尔条约》中就提到了关于建立库尔德自治国的问题。其中条约的第62-64条就涉及到了独立的库尔德斯坦的问题。《色佛尔条约》为库尔德人建国提供了合法性来源。从条约中可以看到，独立后的库尔德斯坦失掉了大部分土地，但该条约为独立的库尔德斯坦的建立留下了空间，同时也成为此后库尔德人追逐建国梦所必须引证的文献。除了条约给了库尔德人建国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以外，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自身也利用民族自决原则开启了建国历程。

一战后，在与突厥民族建立国家的这场竞赛中，库尔德人建国的速度远不及突厥人，最终让突厥人抢在前面，而库尔德人痛失建国机会。库尔德人之所以没有抓住这次机会，直接原因是库尔德人之间出现了分歧。

一战后，土耳其库尔德人分成了三个阵营：一是独立派。这一派支持抵抗运动，并且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并肩战斗，希望维护穆斯林国家的尊严与独立；二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他们试图借战后列强瓜分中东之机，实现库尔德地区的独立或自治；三是部分部落酋长，他们同情库尔德民族主义，但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而是乘机扩张地盘，建立地方王朝”。^②对于独立派来说，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了凯末尔主义者身上，进而在凯末尔的号召下加入独立战争。幻想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突厥人和库尔德人的多民族国家以维系穆斯林国家的尊严，但1923年土耳其独立战争胜利后，凯末尔却将新国家定义为土耳其人的国家。这一举措打破了他们的建国幻想。而那些寻求自治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们在民族自决原则的鼓舞下，建立了民族主义组织“库尔德斯坦进步协会（KTC）”。与之前库尔

^① Djene Rhys Bajalan,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Question of Kurdish Statehood: A 'Missed' Opportunity?" *Ethnopolitics*, Vol.18 No.1(2019), p.15.

^②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

德民族主义组织不同的是，在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的鼓舞下，该组织发表多篇关于自治或独立的文章和社论。因此，“库尔德斯坦进步协会最重要的方面是，它遵循一条民族主义路线，参与库尔德人政治自决的活动”。^①

1919年，库尔德斯坦进步协会向英国驻君士坦丁堡专员亨利·高夫·卡尔索普的一封信中便列出了一系列目标，包括：

“指定给库尔德人的特定地理区域；库尔德人会很感激能够享有与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迦勒底人、亚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不分种族和宗教一样的特权，并在协约国的盟国手中得到同样的待遇；库尔德人应该获得自治权；库尔德人，特别是乞求英国政府，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帮助他们走上文明和进步的道路”。

②

为了实现自治目标，库尔德斯坦协会开始寻求国际援助。协会成员之一塞米利卡迪尔帕夏表示：“KTC领导人访问了伊斯坦布尔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大使馆，并为库尔德人民的民族权利辩护”。^③库尔德斯坦进步协会的一系列建国行为引起了奥斯曼政府的不安，在回答关于库尔德人绕过奥斯曼政府与英国交涉的原因时，协会代表梅弗兰·扎德尔法特强调：

“根据威尔逊提出的原则，每个民族都有权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库尔德人确信，能够确保他们自由和安全的唯一力量是英国。因此，他们认为最好与英国当局接触。我问土耳其政府如何可能给予库尔德人任何形式的自治权，因为土耳其人自己并不确定自己的未来”。^④

从中可以看出，库尔德斯坦进步协会将英国等西方大国视为他们建国成功的重要依靠，说明库尔德人对突厥人丧失了信心。一战后，由于库尔德人依靠的英当局在土耳其独立战争中被凯末尔军队打败，那么在中东库尔德问题上，英国当局就丧失了发言权。现在凯末尔政府是胜利者，在库尔德问题上凯末尔政府有发言权。除此之外，库尔德部落领导人也发动起义以寻求独立。虽然这些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也表明在追求独立建国的道路上库尔德人从未放弃。总之，在民族自决权的号召下，库尔德人利用了各种方式来获得独立建国的机会。1923年《洛桑和约》的签订以及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使得库尔德人的建国梦化为泡影。

^① Hakan Ozoglu, “Does Kurdish Nationalism Have a Navel?” In Ayse Kadtoglu and E • Fuat Keyman (eds), *Symbiotic Antagonisms :Competing Nationalism in Turke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1, p.217.

^② Djene Rhys Bajalan,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Question of Kurdish Statehood: A ‘Missed’ Opportunity?” *Ethnopolitics*, Vol18, No.1,(2019), p.16.

^③ .Hakan Ozoglu, “Does Kurdish Nationalism Have a Navel?” In Ayse Kadtoglu and E • Fuat Keyman (eds), *Symbiotic Antagonisms :Competing Nationalism in Turkey*, p.218.

^④ Hakan Ozoglu, “Does Kurdish Nationalism Have a Navel?” In Ayse Kadtoglu and E • Fuat Keyman (eds) *Symbiotic Antagonisms :Competing Nationalism in Turke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1,p.219.

突厥民族与库尔德民族之间展开的建国活动的竞赛，最终以突厥民族的获胜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而结束。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其成为新的国际体系内的主权国家。“国家主权具有对内和对外双重属性。国家对内属性是指国家的最高政治统治权力，可以通过颁布宪法和法律决定国家结构、决定政府组织等。国家主权对外属性则是主权国家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处理国际事务的最高决定权”。^①简言之国家主权即是对外独立权与对内管辖权。而对于库尔德人来说，由于错过了国际体系变动所创造的最佳建国时机，他们不仅没有实现自身的建国梦，反而沦为土耳其共和国国家建构的对象，也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1923 年《洛桑和约》签订后，库尔德斯坦被划分到了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等四个国家，而库尔德人则成了四国内的少数民族。其中，土耳其库尔德人口所占比重最大，因而土耳其在建立之初就面对着将库尔德人整合到国家内部的艰巨任务。作为主权国家之一的土耳其，已经拥有了国家主权，这就表明土耳其有权利在自身国家内部实行民族政策来整合国内的少数民族。

第四节 凯末尔政府对库尔德政策的国际政治分析

总的来说，从一战结束到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期间，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政策主要以团结为主。可以说，这一时期凯末尔政府的库尔德政策与国际体系的转型有着很大的关系。首先，一战后所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取代了原来的维也纳体系，同时奥斯曼帝国也被肢解，中东地缘版图破碎化。国际体系的变动以及中东地缘版图的变化，给奥斯曼帝国内的突厥民族重组国家和库尔德民族建立新国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1918 年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了遏制英法在中东的力量，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为突厥民族重建国家和库尔德民族建立新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突厥民族和库尔德民族展开了创建国家和重建国家的竞赛。

1920 年《色佛尔条约》签署后，土耳其陷入亡国危机，而为了挽救国家，凯末尔党人一方面发起了独立战争，用武力抗击英国和希腊的入侵；另一方面，凯末尔党人采取断臂求生的策略。他们抛弃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奥斯曼主义。他们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领土仅仅局限于小亚细亚半岛，比原来的奥斯曼帝国的领

^① 黄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 17 页。

土大大缩小，这就使他们在与库尔德人建国的竞赛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主权国家。他们在与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的建国竞赛中获得了胜利。《洛桑条约》的签订使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地盘彻底纳入了土耳其共和国的版图。此外，凯末尔在独立战争期间采取了团结库尔德人的政策，也是其策略的表现。由此看来，土耳其民族领导人凯末尔的雄才大略在国际体系变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其次，这一时期的凯末尔的库尔德政策也是土耳其与列强围绕库尔德斯坦地区博弈的产物。早在 20 世纪初期，英、法、美、俄、德等国就开始了对于库尔德斯坦地区的争夺。一战以后，德国战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美国重回孤立主义。因而只有英法两国成为争夺库尔德斯坦地区的主要力量。1916 年英法就对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东南部地区签署了秘密条约，即《赛克斯-皮克特协定》。“1916 年英、法签署的《赛克斯-皮克特协定》是关于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东南部地区的一个基础性文件”。^①按照该协定，俄国获得了奥斯曼帝国东南部省份，法国获得伊拉克北部，而英国则分得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作为真正操盘手的英国有一个基本设想，在俄、法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从根本上保障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战略安全”，^②但 1917 年十月革命后，俄国便退出了对库尔德斯坦的争夺。1918 年奥斯曼帝国战败，与协约国签署了《摩得洛司停战协定》后，依据《赛克斯-皮克特协定》来进行战后版图的划分就成了协约国的主要任务。

1917 年俄国退出后，“英国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成了博弈的主要力量”^③，库尔德人则成为了棋子。英国想要让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与自己共同占领安纳托利亚东部，而土耳其则想要将其纳入到自己国家领土之内。在此设想下，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采取了联合库尔德人的政策。1919 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埃尔祖鲁姆召开了保卫权利大会。会上凯末尔声明东南部六省份是土耳其不可分割的领土，同时还制定了《国民公约》，反对外国对土耳其领土实施委任统治，不接受土耳其沦为西方保护国的地位。1920 年《色佛尔条约》的签订后，凯末尔等民族主义者为了捍卫国家领土，进而发起了独立战争。最终，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在与英国争夺库尔德斯坦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

总之，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战后国际关系的转型给库尔德人建国和突厥人复国后国家体制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此时，作为主体民族的突厥民族

^①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与库尔德问题的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2 页。

^②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与库尔德问题的演变》，第 152 页。

^③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与库尔德问题的演变》，第 155 页。

和作为帝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库尔德民族，二者都有权利利用民族自决原则建国和复国。在建立民族国家的竞赛中，凯末尔党人赢得了胜利。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自然剥夺了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在土耳其共和国主权范围内建国的权利。凯末尔党人不仅赢得了与土耳其共和国主权范围内少数民族建国竞赛的胜利，还在军事上打败了英国和希腊的入侵，赢得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主要部分。这些胜利，体现了凯末尔党人的智慧和才能。凯末尔党人利用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东格局变迁成功建国的策略，以及与英国等协约国在库尔德斯坦问题上博弈的胜利。这不仅捍卫了突厥民族尊严，而且也为土耳其共和国赢得了相对多的领土。当然也给凯末尔党人建国后，处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埋下隐患。

第三章 土耳其共和国库尔德民族政策的国家建构视角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出现在了世界。每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都要面对国家建构问题，土耳其也不例外。同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一样，在国家建构中，土耳其面临着如何将库尔德人为主的少数民族纳入到国家建构之中这一问题。为此，本章将从国家建构这一视角来探析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政策。

第一节 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与土耳其民族主义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便开始了民族国家建构历程。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建构主要分为两个步骤即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其中国家建构是指政权机构的建设即建设军队、警察政府及官僚机构等。民族建设则是指创建民族认同的塑造，让人们对所属的民族忠心耿耿，以取代部落、村庄、地区和种族的效忠。可以看出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是一体两面，国家建设为民族建设提供了基础和保障，而民族建设则为国家建设提供了认同基础和合法性来源。

共和国成立后，受到西方民族主义影响的凯末尔，一心想要把土耳其打造成为西式的现代化国家。其实，早在 1921 年独立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凯末尔在大国民议会就提出要建立一个土耳其人为主的国家。为此，凯末尔以这一目标为核心开启了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与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一样，刚刚成立的土耳其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国内少数民族这一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土耳其就要进行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所不同的是“民族建构的目标是实现和保有统一的国族认同，而国家建构的目标则是建立现代国家”。^①对于土耳其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内存在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与特殊文化群体，因而也就存在着不同的认同对象，而这些认同有可能会威胁到对国家的认同。因而，土耳其民族建构的任务就是将国内的多种认同打造为统一的国家认同。而这一目标又无法通过强权政治来实现，所以通过民族建构的方式来打造国家认同也成了土耳其国家建构的主要方式。土耳其民族建构的关键就在于塑造统一的民族认同，进而从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所谓民族认同，顾名思义就是个体对所属民族的认同以及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

^① 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7 页。

史文化传统、价值观、理想信念和国家主权的认同”。^①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前提，而国家认同则进一步保护了民族认同。所以，对于土耳其来说其民族建构的重要任务就是将国内的诸多认同层次合而为一，塑造出统一的民族认同，进而将其上升到国家认同。因为“公民国家需要不断引导民族认同上升到国家认同，如果停留在民族认同则可能阻碍国家认同的建立”。^②

在土耳其成立后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凯末尔提出了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平民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和共和主义六项原则。这六项原则之后被写入共和国宪法。而凯末尔的民族主义原则成为了国家构建的重要原则。“凯末尔的民族主义，其实质在于放弃传统的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强调土耳其民族主义，强调共和国的单一民族性，强调土耳其民族与土耳其共和国的一致性。凯末尔政府旨在强化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的社会凝聚力与政治向心力”。^③可见，凯末尔的民族主义原则就是利用土耳其民族主义将土耳其打造成一个以土耳其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

凯末尔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深受西方传统民族主义的影响，为此凯末尔极力想要将土耳其打造为以土耳其民族为主体的单一民族国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凯末尔强调了土耳其民族的以下特点即“共同的语言、共同起源、共同过去、共同地域、共同文化”。^④首先。从共同语言的角度来看，凯末尔欲将突厥语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他认为，土耳其民族的语言是突厥语，突厥语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易学和最丰富的语言。在共同地域和共同起源方面，凯末尔强调“突厥民族生活于亚洲西部、欧洲东部、黑海与地中海之间，这里是举世闻名的伟大家园”。^⑤很明显。凯末尔关于土耳其境内各民族共同起源于共同地域这一言论模糊了各民族之间的边界，为此后对库尔德人的同化政策提供了支持。在共同历史方面，凯末尔将土耳其人的历史追溯到了史前时期。凯末尔的这一说法的目的在于模糊突厥民族的历史特性，因为“这段历史时间已经足够悠久，使有着共同起源但生活于不同地方的人有了各个地方的特征，原来的共性已经泯灭”。^⑥凯末尔的这种错误的民族史观，忽视了土耳其境内各民族自身的历史，通过这种方式强行将

^① 贺金瑞 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7页。

^② 贺金瑞 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第7页。

^③ 哈全安：《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页。

^④ 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54页。

^⑤ 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第254页。

^⑥ 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第255页。

境内少数民族整合到土耳其历史中。在共同文化方面，自共和国建立之时，凯末尔就给土耳其民族的文化附上了一层世俗化的色彩。为此将伊斯兰排除在了民族文化之外。在此基础上凯末尔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关闭宗教学校并将宗教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总之，凯末尔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就是利用突厥族的语言、历史和文化来构建出一个土耳其民族。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为土耳其民族做出了定义；另一方面，也塑造出了整体的民族认同。凯末尔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强调了民族的整体性，也塑造了统一的民族认同。因此，对于凯末尔来说国内的任何不同的民族文化认同都被视为对土耳其民族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威胁。“在这里，最终导致库尔德人不满意的种子被种下：在一个现在被正式定义为“土耳其”的国家，库尔德人不是土耳其人，只有放弃他们的种族，他们才能被当作土耳其人对待。很明显，凯末尔政权的领导人认为，尚未统一，尚未土耳其化的库尔德人既是落后的因素，也是他们意图建设的现代国家的完整性的潜在威胁”。^①为此，凯末尔开始对国内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少数民族采取了强行同化政策。

第二节 执行扼杀与同化库尔德民族的政策

为了强行将境内的库尔德人整合为土耳其人，凯末尔对库尔德人采取了强行同化措施。总的来看，凯末尔的强行同化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即语言同化、强制迁移和身份否定和世俗化等四个方面。

语言同化：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在民族认同及民族主义中占有重要位置。安东尼·史密斯在他的著作中就提到了语言对于族群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从诸如文字、标志、语言、建筑及服饰等象征机制的角度来考虑民族群体的持久性”。^②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于1924年颁布了《统一教育法》。该法强调要打造一套世俗化，中央集权化的土耳其教育体系。该法废除了提供库尔德语教学的所有宗教学校，并规定所有学校只能教授突厥语，而且库尔德语等小语种教学也只能被纳入到突厥语教育体系之下。除此之外国家还禁止在公共场合和私人交往中使用库尔德语。众多库尔德书籍和文章也被禁止，就连“库尔德”和“库尔德斯坦”的名称都被禁止，代之以“山地土耳其人”和“东方土耳其人”。

^① Henri J. Barkey and Graham E. Fuller, *Turkey's Kurdish Ques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p.10.

^② Anthony Smith, *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 A Cultural Approach*,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9, p.23.

谢赫赛义德叛乱后，国家加速了将库尔德人“突厥化”的进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个人姓氏调整和地方名称的修改。“1934年，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姓氏法》，该法要求所有的公民都要采纳土耳其姓氏。许多库尔德人被迫使用土耳其姓氏”。^①《姓氏条例》对姓氏的语言规定更加明确，其中第5条规定“新姓氏必须用土耳其语。第7条规定：禁止使用外国种族和民族的姓氏。第8条规定：禁止使用部落或宗族的姓氏作为新的姓氏”。^②除了个人姓氏的修改外，国家还对库尔德地名做了修改。“1940年内政部通过了8589号法案更改地名法案正式生效，法案规定外语或原地名要被土耳其语取代”，^③但由于二战的爆发，该法案并未得到执行。在1952年国家建立了“更名委员会”。该委员由内政部长、军队军官、土耳其语学者及大学教授组成，有权利对所有库尔德语的地名做修改。委员会一直运行到了1978年，期间共修改了28000个非土耳其语的地名。无论是对个人姓氏还是对地方名称的修改，本质上都是对库尔德民族同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强制迁移：强制迁移即将东南部库尔德人强行迁移到西部地区，使其与西部地区相融合，从而达到同化的目的。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国家在1934年制定了《定居法》。该法将国家分为三个地区：“讲突厥语并且属于土耳其族裔的地区；不讲突厥语但认同土耳其文化的地区；不讲突厥语也不认同土耳其文化的地区”。^④而第三个地区就包括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第三个区域就是《定居法》主要涉及的区域。因为这些地区就是库尔德人叛乱发生的主要地区。可以看出，《定居法》的重点就是库尔德斯坦内的库尔德人。“该法的目的就是将落后的库尔德地区改造为文明和现代的区域，将遣散安纳托利亚不属于突厥文化的人群，并用拥有突厥文化的群体来取代”。^⑤因此国家的迁移政策就是为了去除他们的库尔德特性。

在1934年的《定居法》中库尔德人那种传统的宗亲-血缘体系成了主要的去除目标，因为国家认为这种制度是落后，消极的，并与当代国家对立。该法也改变了库尔德人那种传统的生活习惯与居住方式，将库尔德人强行拆分为以父母子女为核心的家庭单位，改变了他们原始的大规模群居的方式。在《定居法》颁布

^① Dicle Cemiloglu, “Language Policy and National Unity: The Dilemma of the Kurdish Language in Turkey” <http://repository.upenn.edu/curej/97>, 2021年11月29日。

^② Derya Bayir,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in Turkish Law*,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p.105.

^③ Derya Bayir,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in Turkish Law*, p.105.

^④ Kemal Kirisci, “Migration and Turkey: the dynamics of 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Resat Kasaba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Turkey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80.

^⑤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与库尔德问题的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8页。

后成千上万的库尔德人被强行迁移到了西部地区。为了保证该法的实行，国家还在库尔德地区设立了检察总局。“首个检察总局设立在了迪亚巴克尔、艾拉泽格、乌尔法、凡、比特丽兹、希尔特和马尔丁等省份。尽管有文明开化的特性，但统治者的权利凌驾于所有民事、军事和司法机构之上，因为它是该地的最高行政当局”。^①监察总局有权力将一个地方的一家人或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国家的强制迁移给库尔德人带来了灾难性影响“在 1928-38 年期间总共有 10000 座房屋被毁，超过 15000 人被杀，50 万人被驱逐其中 20 万人死于路上”。^②

身份否定：为了进一步加速对库尔德人的同化，国家直接采取了不承认政策。凯末尔就曾说道“今天的土耳其国家，有些人将自己视为库尔德人，切尔克斯人和拉兹人。这些是专制时期的旧的称谓，只给国家带来了悲哀，除了少数愚蠢的反动分子外，这也成了敌人的工具……，由于采纳了这种错误的称谓，才使得国家的成员感到了悲伤……因此，我们应继续将土耳其认同作为我们的第一认同”。^③凯末尔此番演讲意味着国家并不承认少数民族的第二身份，因为这会使得库尔德人培养出他们自身的族裔认同从而影响国家认同。1935 年，伊诺努将东南部城市分为库尔德人居住的城市和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城市。在库尔德人城市中库尔德认同是他们的主要认同，而在部分库尔德人居住的城市中，库尔德认同则是他们的次要认同。从凯末尔的演讲和伊诺努对城市的分类可以看出国家并没有否定库尔德人的身份，而是采取了不承认的政策。这里要注意否定是指忽视现象的发生，而不承认则是指不公开承认这一现象。国家之所以采取不承认态度就在于阻止库尔德人次要认同的构建，从而用土耳其第一认同去替代他们的第二认同以完成对他们的同化。正如哈坎·亚伍兹认为的那样“国家并不否认库尔德人的存在，但却建构了一个新的话语来指代他们，而不是在民族意义上发出‘库尔德’这个词。通过将库尔德部落描述成反动的，落后的以及危险的，国家进而将自己视为现代的，世俗的和先进的”。^④

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强调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削弱宗教力量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将宗教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为成功实现世俗化改革，凯末尔实行了相应的措施。比如，废除了宗教学校；撤销了宗教法庭；罢免了穆夫提；宗教法官即卡迪纳入到世俗司法体系之内；成立隶属于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取消宗教课程，

^① Derya Bayir,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in Turkish Law*,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p.139.

^②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I.B.Tauris & Co.,Ltd, 2007, p.200.

^③ Metin Heper, *The State and Kurds in Turkey: The Question of Assimilation*, Plagrave Macmillan, 2007, p.161.

^④ M. Hakan Yavuz, "Five Stag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Kurdish Nationalism in Turkey",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cs*, Vol.7 No.3 (2001), p.8.

所有的学校纳入到政府管辖之内，实行单一的世俗教育。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便是废除哈里发制度。1924 年哈里发的废除使得东南地区的库尔德人失去了精神依靠与自身认同，同时也斩断了土耳其与库尔德民族的联系纽带。

凯末尔的语言同化、强制迁移以及世俗化等政策分别从语言、地域、历史以及文化角度对库尔德人进行了同化，这些措施与凯末尔所定义的土耳其民族特性即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历史以及共同地域之间形成了一种呼应。凯末尔的这种强制性同化不仅忽视了库尔德民族自身的特性。同时也损害了突库民族二者间的情感，最终导致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激进化。库尔德人开始通过武装叛乱的方式来争取其自身的民族诉求，给土耳其国家带来了安全威胁。

第三节 库尔德民族的抗争成为长期影响土耳其政局的因素

凯末尔的这种激进的民族政策最终导致了库尔德叛乱的发生，威胁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安全。这一时期主要有三次大规模的库尔德叛乱：1925 年谢赫赛义德叛乱、亚拉腊山起义以及德西姆叛乱。

1925 年谢赫赛义德叛乱是共和国初期的首次大规模的库尔德人叛乱行动。与之前的库尔德人叛乱行动不同的是，此次叛乱行为有“阿扎迪”这一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阿扎迪”创立于 1921 年，由前埃尔祖鲁姆游击队首领哈立德贝格·季博兰所建立，是库尔德人建立的民族主义组织，谢赫赛义德便是组织成员之一。1924 年“阿扎迪”召开首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要发动叛乱，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自治国，但不就便被土耳其政府发觉，众多领袖被逮捕，组织陷入了群龙无首阶段。这时，谢赫赛义德成为了组织的领导人，为了躲避政府追查以及动员群众，他开始在利斯-帕卢等地游历。1925 年谢赫赛义德到达皮兰后，有几名不法分子被土耳其宪兵追捕进而加入到了赛义德麾下，宪兵队要求赛义德交出罪犯。谢赫赛义德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导致了叛乱军与宪兵队的第一次交火。谢赫赛义德曾劝说过土耳其士兵“我请求你们不要去触碰那些库尔德人，以免带来不必要的后果”。^①面对如此局势，赛义德别无选择，只得发动叛乱。

叛乱初期，进展十分顺利，叛军夺得了达赫尼、利斯、帕卢以及艾拉泽格等地，叛军势力四处开花。面对着势如破竹的库尔德叛乱，土耳其政府意识到了问

^① Kendal, "The Kurdistan in Turkey",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Olive Branch Press, 1993, p.52.

题的严重性，进而于 1925 年 3 月开始向东南部大规模派兵以镇压叛乱。土耳其政府如此缓慢行动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叛乱爆发时库尔德地区处于冬季被积雪覆盖不便行动；另一方面，部署在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第 7 和第 8 集团军内部有大量的库尔德人，他们不值得政府信任。其实，早在叛乱发生初期，土耳其政府就对此有所察觉，但直到 2 月底才意识到了叛乱的严重性，开始采取行动。在法国的帮助下，土耳其政府得以将军队通过铁路输送到叛乱地区。为了镇压此次叛乱，政府甚至动用了空军力量。最终在陆军和空军的联合作战之下，此次叛乱最终被镇压，叛军悉数逃至了伊朗和伊拉克等地。而以谢赫赛义德为首的叛乱领袖在迪亚巴克尔被处以死刑。作为新生共和国建立的以来的首次库尔德叛乱：“这次叛乱既有宗教性质也有民族主义性质，它既是对新政权世俗主义和反伊斯兰倾向的反抗，也是第一次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萌动，尽管受到区域限制”。^①1925 年的谢赫赛义德叛乱也为今后的库尔德叛乱行为定下了基调。同时，谢赫赛义德叛乱的爆发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意味着政权态度的转变，从忽视库尔德人转向暴力政策”。^②

亚拉腊山起义：1925 年谢赫赛义德叛乱被镇压后，部分库尔德人逃到了伊朗和伊拉克一带的亚拉腊山中。在那里，库尔德人之间组成了联盟。1927 年，联盟成立大会在黎巴嫩的比汉姆顿举行。会上，各方库尔德人代表同意组建联盟。与谢赫赛义德叛乱不同的是，此次起义行动联合了亚美尼亚人。“来自达什纳克党的亚美尼亚领导人瓦汗帕帕兹扬出席了大会”。^③与亚美尼亚人的联合正符合了那些想要与外界力量相联系的库尔德领导人的意愿。

亚拉腊山之所以成为起义中心原因：一方面在于库尔德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联合，该地域适于二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另一方面，有利于与伊朗方面建立联系。这样一来，伊朗帕迪沙阿^④既可以削弱土耳其，也可以将库尔德人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沙阿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他能削弱他的对手土耳其，能够控制库尔德人的起义”。^⑤库尔德人与亚美尼亚人的联合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担忧，于是政府开始与库尔德进行谈判。1929 年，伊赫桑努里帕夏将军的部队夺去了亚拉拉特山到凡和比特丽兹北部地区的控制权，将军尽可能的延长了与土耳其的谈

^① Henri J. Barkey and Graham E. Fuller, *Turkey's Kurdish Ques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p.10.

^② Henri J. Barkey and Graham E. Fuller, *Turkey's Kurdish Question*, p.11.

^③ Kendal, "The Kurdistan in Turkey",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p.52.

^④ 沙阿：波斯国王的头衔

^⑤ Kendal, "The Kurdistan in Turkey",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Olive Branch Press, 1993, p.52.

判时间。同时，由易卜拉欣帕夏领导的民主政府在所有解放地区挂起了库尔德斯坦国旗。这时，土耳其政府意识到谈判只会有利于库尔德人。于是，开始召集军队对该地区的库尔德人进行镇压，同时与伊朗沙阿进行谈判，沙阿最终决定切断对库尔德人援助。最终，在土耳其政府的外交努力以及军事镇压之下，起义行动在 1930 年被镇压。

德西姆地区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四周多山，地理环境较为封闭，人口多以阿拉维派库尔德人为主。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德西姆地区长期处于自治状态，因而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较为疏远，进而也成为了叛乱多发地区。所以，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将德西姆地区变成了“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化的试验田”。^①三十年代后期，土耳其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愈加激进化。为了进一步同化库尔德人，他们将库尔德人强行迁移至西部地区，同时也加重了对库尔德语言的限制。“1935 年，安卡拉政府正式将德西姆改名为通杰利，从空间和意义上对德西姆进行了重新塑造”。^②更名后的通杰利省受总督管辖，这样就使得该地区直接被纳入到了安卡拉政府的管辖之内，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如此严苛的民族政策最终遭到了德西姆地区库尔德人的反抗。

1937 年，在部落首领赛义德·勒扎以及哈桑·梅基的带领下，叛乱爆发。一般观点认为，此次叛乱分为两个阶段：1937-1938 年为第一阶段；1938-1939 年为第二阶段。为了镇压此次叛乱，“政府派遣了特别行动队以及大量军队到德西姆”。^③同时，政府还动用了飞机、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双方之间也有着差别悬殊的兵力比，“库尔德叛军与政府军的兵力对比为 1:33.34”。^④最终，在强大的武器力量以及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下，德西姆叛乱最终被镇压。与之前的镇压行动相比，此次镇压行动更加暴力。“人们被关进洞穴和牲畜棚里以及被土耳其军人活活烧死。森林被军队包围并被点燃以防止里面有庇护所。许多库尔德女性与儿童被扔进孟祖尔河”。^⑤此次镇压行动给库尔德人带来了重大伤亡，同时数十万库尔德人被迫迁移，背井离乡。德西姆地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德西姆叛乱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陷入低谷。

由于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凯末尔一心想要将土耳其打造为西式的单一

^①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与库尔德问题的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26 页。

^②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与库尔德问题的演变》，第 229 页。

^③ Kendal, “The Kurdistan in Turkey”,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p.52.

^④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与库尔德问题的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32 页。

^⑤ Kendal, “The Kurdistan in Turkey”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Olive Branch Press, 1993, p.52.

民族国家。在此基础上，凯末尔提出了民族主义原则，而其核心便是利用土耳其民族主义将国家塑造为一个有着统一的语言、相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特征的土耳其国家。在进行民族建构的过程中，凯末尔操之过急并未考虑到国内的实际情况。在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下，凯末尔的对国内的库尔德人采取了同化政策，这种政策并未考虑到库尔德人自身的民族特性与情感。在这种激进的民族政策下，库尔德民族主义走向了极端，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库尔德叛乱，威胁到了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给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带来了阻碍。

第四节 土耳其国家建构与库尔德政策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开启了国家建构历程。正如国内著名民族学家宁骚所认为的那样，“民族国家建构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项根本要求和本质内容”。^①国家建构的任务就是从各方面打破地区和民族间的壁垒，建立一个统一的集中性质的权力体系，打造出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传播统一的语言以及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统一的文化模式。要完成这些任务，一项基本任务便是将国内各民族的自身认同打造成对国家的忠诚。因为，国家构建的实质在于塑造国家的统一性以及文化上的同质性，是国民对主权国家的文化上、政治上的认同。所以，国家建构的核心便是培养国内各民族统一的国家认同。

对于土耳其来说，由于其已经建立了民族国家，也就拥有了国家主权。所以有权力在不受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进行国家建构，出台相应的民族政策以进行民族整合。“大多数被认为是以公民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都有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核心，这些核心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寻求同化或整合同一国家内的其他国家或民族群体，以形成共同的公民文化和意识形态。因此，在现实中，国家可能只建立在宣示性公民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核心的领导人可能会通过故意将其政策与公民民族主义的政策相一致来寻求将其权威合法化”。^②所以，就无法避免主体民族采取极端的民族政策来对国内的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在土耳其国家建构中。由于凯末尔政府操之过急，一心想要将土耳其打造为西式国家，因此便对国内的库尔德人采取了强行同化政策，从而导致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激进化。

^①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4 页。

^② Kemal Kirisci and Garrth. M. Winrow, *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 An Example of a Trans-state Ethnic Conflict*, Routledge Curzon, 2003, p.8.

从国家建构视角来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土耳其在国家建构之时采取相应的民族政策整合国内库尔德人无可厚非，因为“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认为民族国家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①由于土耳其已经建立了民族国家，因而可以利用国家权利来整合境内的少数民族，但其错误的民族政策却忽视了库尔德人的特性和自身权益。为此，本文认为在今后土耳其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要在维持土耳其民族主体地位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国内少数民族的权利与利益，实现各民族平等。因为只有实现了民族平等，才能实现各民族间的团结，才能更好的将库尔德人整合到国家建构之中。

^①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0 页。

第四章 土耳其凯末尔政府库尔德政策的民族主义视角

在土耳其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了国家建构的重要工具。民族主义作为国家建构的重要工具，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创建新的民族国家；二是在既有的国家框架内，完成民族主义整合，即通过整合国内的不同族群生成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①对于土耳其国家来说，1923年共和国的成立，表明其已经利用民族主义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创建。所以利用民族主义来打造国家认同就成了土耳其国家建构的重要任务。作为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之一，土耳其境内民族构成复杂，而其中对民族建构构成挑战的则是东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如何将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整合为对土耳其国家的认同就成了民族建构的重要任务。因而，在国家建构初期，凯末尔便利用土耳其民族主义来对境内的库尔德人进行整合，但其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最终激发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导致了库尔德叛乱的爆发，库尔德民族主义也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一大竞争对手。为此，本章重点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来探析土耳其共和国的库尔德政策。

第一节 土耳其民族主义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博弈

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库尔德政策以及此后库尔德人相应的反抗实则是一场库尔德民族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之间的竞争。作为19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学者们对民族主义的见解也是各不相同。其中，笔者最为赞同的则是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定义。“民族主义可以定义为一个群体实现和维持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部分成员认为意识形态运动构成一个真正的或潜在的民族”。^②由此可见，安东尼·史密斯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这种思想对民族的统一和维持自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此，民族主义自产生之时起，就成为进行民族国家建构或争取民族权利的重要工具。对于土耳其人来说，由于其在一战后及时抛弃了奥斯曼主义，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将奥斯曼帝国转型为土耳其共和国，先于库尔德人完成了国家的建立。所以，民族主义就成了土耳其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但库尔德人由于民族发育不成熟，因而在战后失去了建国有利时机，所以成了土耳其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因而对于库尔德人来说，

^① 王文奇：《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析论》，《史学集刊》2011年第3期，第106页。

^② Anthony Smith,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Polity Press, 2010, p.9.

民族主义思想则成了他们争取民族权利和自治的工具。

一、土耳其民族主义

19 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逐渐衰微，西欧列强便开始以各种方式对帝国进行经济、政治以及思想上的渗透，进而也将西欧的民族主义思想传入到了帝国境内。受此影响，突厥人之间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想。而在 20 世纪初，则出现了一位突厥民族主义的集大成者—格卡尔普。作为突厥民族主义的集大成者，齐亚·格卡尔普认为 20 世纪初期的突厥民族主义主要面临两个任务：“从文化角度确定突厥人的民族认同；把突厥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嫁接，走向现代化”。^①整体来看，齐亚·格卡尔普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通过重构一个世俗的、进步的突厥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为土耳其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提供历史依据与合法性。齐亚·格卡尔普的民族主义思想在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被凯末尔等人所继承。

在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意图将土耳其打造为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化国家。“在寻求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凯末尔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决定效仿西方的‘同质’国家”。^②因为，在土耳其国家精英们看来，原来的帝国体制是落后的和反动的，那么就意味着无法与当时的欧洲国家进行竞争，因为当时的欧洲国家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国家；而且帝国的伊斯兰神权体制和伊斯兰教是国家进步的一大障碍。所以，要想使国家进步，就要摆脱原有体制的束缚。要想达到此目的，最重要的就在于将国家打造为现代化国家。在打造现代化的土耳其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想便成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被视为政治或经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是构成社会变革原动力的意识形态”。^③因而在追寻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主义就成了重要工具，正是借助民族主义思想，国家精英们开启了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作为现代性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利用民族主义迅速启动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现代化，以创建一个现代的制度性政治结构。快速的现代化不仅是追赶西方文明的需要，也是使土耳其国家更加安全和强大的需要”。^④所以，对于土耳其这一新兴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

^① 咎涛：《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论齐亚·格卡尔普“托古改制”式的民族主义》，《西亚非洲》2008 年第 8 期，第 19 页。

^② Henri J. Barkey and Graham E. Fuller, *Turkey's Kurdish Ques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p.11.

^③ Fuat Keyman, “Nationalism in Turkey: Modernity, State, and Identity”, in Ayse Kadtoglu and E. Fuat Keyman (eds), *Symbiotic Antagonisms: Competing Nationalism in Turke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1, p.14.

^④ Fuat Keyman, “Nationalism in Turkey: Modernity, State, and Identity”, in Ayse Kadtoglu and E. Fuat Keyman (eds), *Symbiotic Antagonisms: Competing Nationalism in Turke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1, p.15.

义这一意识形态早已脱离了“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意义。其重点在于鼓励落后的社会群体为实现自身的自由和繁荣而奋斗。同时，对于一个新兴的土耳其国家来说，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发展、国家独立和繁荣富强，也代表着自身安全感的加强。

土耳其现代化的进程中，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我们是谁？”。1923年土耳其击败希腊等侵略者，获得了独立。殖民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便成为了团结所有国民的精神纽带。民族国家建立后，共同抵御外辱的这一目标也随着消失，因而以共同追求进步和反抗压迫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自然也无法支撑起国民的团结一致。这样一来，土耳其就面临着如何定义“我们是谁”这一问题，因为对于土耳其而言，这不仅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同时也是合法性的来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土耳其政府开始利用民族主义来打造一个同质化的国家，因为“现代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同质化”。^①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土耳其政府开始对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少数民族采取了极端化的同化政策，意在将国家打造为一个以土耳其人为主的单一民族国家。在此基础上，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实行了语言同化、身份否定、强制迁移等一系列强制性措施，同时也在宪法中直接否定了他们的存在。这种极端的同化政策忽视了库尔德人的自身特性，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民族利益。最终使得库尔德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给土耳其国家带来了安全威胁。

总之，在土耳其的现代化过程中，土耳其民族主义成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与指导思想。在民族主义的指导下国家开启了民族化改革，凯末尔的民族化改革无疑开启了政治压迫的大门。在民族化改革的压迫下，库尔德人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所以，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国家现代化非但没有将库尔德人纳入到现代化轨道中，反而因为其错误的民族政策激发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二、库尔德民族主义

同土耳其民族主义一样，库尔德民族主义也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战后的国际环境也为库尔德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建国时机，但由于库尔德人内部的分歧，最终失去了建国机会，从而在与突厥民族进行抢先建国的竞争中失败，成了土耳其国内的少数民族。此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就从寻求建国转移到了维护自身民族权利与争取自治上来。事实上，建国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

^① 丁虹：《民族主义与现代性：基于新兴民族国家的分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3期，第158页。

展更多的是对土耳其国家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反应。“现代化需要建设一个能够提供广泛服务的中央集权国家。要用强调理性、科学和个人主义的方式取代奥斯曼帝国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迷信、宗教和社区观念，‘价值观革命’是至关重要的。土耳其人民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共和制国家，而不是一个破旧的帝国”。^①为此，要想实现现代化就要对原有的神权封建政体进行改革，以此来与旧政权割裂。

以此作为目标，土耳其首先实行了世俗化改革，废除了以苏丹哈里发制度为主的封建神权政体，将伊斯兰教置于了国家监管之下，实行政教分离。

世俗化改革固然对土耳其国家现代历程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对于东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来说，这就意味着抹杀掉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其原因在于库尔德人闭塞的生活环境和部落制的社会结构，闭塞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远离世界，因而像民族主义这样的西方思想只能在受到过先进教育的少数库尔德精英中存在。而长期的部落生活使得部落认同也成了他们重要认同形式之一。“这一情况直到独立战争后期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库尔德人的认同仍然主要通过家族、部落和宗教来定义，而不是通过任何形式的民族来加以确定”。^②所以，对于长期居于大山的库尔德人来说，部落和宗教成了他们认同的重要方式。1924年哈里发制度的废除，库尔德人内心的宗教情感面临着崩塌，同时也割断了突厥人与库尔德人之间联系的共同纽带。这也成了1925年谢赫赛义德叛乱的重要原因。

著名库尔德学者哈米特·博扎实兰就认为“国家放弃奥斯曼帝国的遗产，放弃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精神支柱，可能是库尔德抵抗运动的另一个原因”。^③此外，在1925年谢赫赛义德叛乱期间，赛义德给各部落首领的信中也明确了这一点：“以前，我们有一个哈里发国，这给了我们与土耳其人同属一个共同体的感觉，自从废除了哈里发留给我们的只有土耳其的压迫感”。^④因此对于赛义德来说，土耳其的世俗化政策意味着对先知的否定以及对伊斯兰教的背叛，为此他的任务便是推翻世俗共和国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

此外，土耳其国家要想顺利推进现代化历程，就需要建设一个能够提供各种服务的中央集权国家。这就意味着要将土耳其边缘地区纳入到中央体系之下，进而也就触犯了传统的库尔德精英的利益。为了捍卫自身利益与追求独立地位，库

^① Kemal Kirisci and Garrth. M. Winrow, *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 An Example of a Trans-state Ethnic Conflict*, Routledge Curzon, 2003, p.99.

^②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与库尔德问题的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页。

^③ Hamit Bozarslan, “Kurdish Nationalism in Turkey: From Tacit Contract to Rebellion”, in Abbas Vali (ed), *Essays i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Mazda publisher, 2003, p.179.

^④ Hamit Bozarslan, “Kurdish Nationalism in Turkey: From Tacit Contract to Rebellion”, in Abbas Vali (ed), *Essays i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p.180.

尔德精英们开始利用库尔德民族主义寻求自治。1921年，几名库尔德领袖在优素福·齐亚贝格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库尔德组织“阿扎迪”。在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阿扎迪就将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作为奋斗目标，但由于计划的败露，行动失败，但其也为1925年的叛乱提供了组织基础。1925年谢赫赛义德叛乱期间，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依旧是目标之一。这一点也可以在独立法院对谢赫赛义德出具的判决书中得到证明，在独立法院的判决书中，法官强调：

“这场叛乱是以高举先知旗帜为借口发生的。然而其主要目标是分离土耳其的一部分国土，破坏国家统一。最近土耳其家园东方省份爆发的叛乱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爆发的叛乱性质是一样的……但你们都同意一点：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宪法”。^①

土耳其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进而就要将边缘地区纳入到国家范围内，这也就损害了传统的库尔德精英的利益。为了捍卫自身利益，库尔德领袖们开始利用库尔德民族主义来追求自治。以此为目标，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们发起了一系列叛乱行动，但最终被国家所镇压。

在土耳其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土耳其政府利用土耳其民族主义推进现代化变革，实行了一系列民族政策。这些政策并未考虑到库尔德人的实际状况，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推进现代化变革，最终进一步激化了库尔德民族主义。

总之，土耳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实施的民族政策以及库尔德人的反应实则是一场库尔德民族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之间的博弈。二者有着不同的话语体系与目标，土耳其民族主义强调国家的统一与现代化，而库尔德民族主义则强调捍卫伊斯兰地位以及追求自治。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博弈也是一场传统与现代，中央与地方，世俗与神权的对抗。最终土耳其民族主义获得胜利，库尔德民族主义则成了此后土耳其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大挑战。

笔者认为，库尔德民族主义之所以失败，主要有两方面：尚未动员其广大地区的库尔德群众；尚未脱离部落性质的约束。以谢赫赛义德叛乱为例。在谢赫赛义德叛乱开始之前，赛义德开始在利斯-哈尼一带游历，一方面为了躲避国家的追捕，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动员群众。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总体来看，依旧还有众多的库尔德人尚未被动员。

首先，阿拉维派教徒尚未被动员，1925年叛乱之前赛义德就曾试图动员阿

^① Hamit Bozarslan, “Kurdish Nationalism in Turkey: From Tacit Contract to Rebellion”, in Abbas Vali (ed), *Essays i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Mazda publisher, 2003, p.184.

拉维人加入叛乱，但他们拒绝了，并站在了土耳其一方。其原因在于“他们并不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而且“与其生活在逊尼派控制的库尔德斯坦不如生活在世俗土耳其”。^①阿拉维人的拒绝为今后土耳其人镇压叛乱减少了阻力。

其次，凡城和舍尔纳克间的部落也没有参与叛乱。因为，一方面舍尔纳克部落领袖得到了政府的贿赂，另一方面，舍尔纳克地区的土地肥沃，生活富足，他们并不想加入战争。舍尔纳克的拒绝导致叛乱的范围大大缩减。

再次，库尔德地区的农民以及城镇内的工人阶级和下层人员也没有被动员。因为“叛乱部落认为他们没有战斗价值”。^②这样一来，叛乱的主力就只有讲扎扎语的库尔德部落。这就使得叛乱并未脱离库尔德部落属性。库尔德运动的部落属性意味着部落间很难达成一致的认同与目标，因为各个部落间的矛盾频发，其中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间的冲突，例如库尔德部落与阿拉维部落间的冲突；纳什班迪与非纳什班迪教团间的冲突；不同库尔德部落间的冲突。而在部落内部也存在着众多分歧，诸如部民和农民间的冲突；农民和地主间的冲突；领袖间关于宗教和世俗间的争论。所有这些冲突都限制了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发展。

总之，库尔德民族主义失败的原因重点在于库尔德民族主义自身发展的不成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提出是由于一个民族追求自身利益所提出的一种思想指导。所以，民族主义成熟与否关键取决于一个民族形态发育是否成熟。所以，在土耳其民族主义与库尔德民族主义之间的博弈中，土耳其民族主义取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突厥民族形态比库尔德民族成熟。

第二节 突厥民族与库尔德民族间的发展差异

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形态之一，民族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也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民族的发生发展过程被称为“民族过程”。在对民族过程的研究中，根据民族自身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可将其分为“潜民族”、“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三个阶段。所谓“潜民族”就是潜在的民族。本质上讲，潜民族并不算是民族形态之一，但由于民族并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有其自身的生长和发育过程。民族也是由萌芽状态和潜在状态逐渐形成的，在它们完全凸显、形成完整的民族实体之前，总有一个萌生，孕育的阶段。而这一阶段便是“潜民族”阶段。我国民族学家王希恩在其论著中提到，以下共同体能够被称

^① Robert Olson, *The Emergence of Kurdish Nationalism and the Sheikh Said Rebellion, 1880-1925*,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9, p.94.

^② Robert Olson, *The Emergence of Kurdish Nationalism and the Sheikh Said Rebellion, 1880-1925*, p.98.

为潜民族，即“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宗教共同体以及政治共同体”。^①在“潜民族”的基础上，民族将进一步发展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

“所谓自在的民族即是作为族体已经存在，但却未被自身所认知的民族；而自觉的民族即是不但作为族体已经存在，而且它本身也能感悟到自己存在的民族”。^②从总体的民族成长过程来看，自在和自觉与潜民族一样，是民族发育的两个阶段。因为“自在民族对应的总是原生民族早期的隔绝和次生民族的最初形成；自觉民族对应的则是原生民族的封闭的解除和次生民族较高的发展”。^③从民族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到，在整个的民族发展过程中，自觉民族阶段是民族的成熟阶段。根据以上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的定义可知，一个民族是自在民族还是自觉民族的关键在于其自身是否能够感受到自己民族的存在，这种感觉就是民族认同。所以，一个民族发育成熟与否的标志就是民族认同。很明显，在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成功的关键便是突厥民族是一个成熟的民族，也就是“自觉民族”，而库尔德民族则是一个落后民族。而其中的关键一点便是突厥民族的民族认同感远远强于库尔德民族。

作为民族心理的一种状态，无论是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上，还是作为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民族认同都有着关键作用。关于民族认同的定义，学者们都有着不同的理解。英国族裔-象征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在其著作中将“民族认同”定义为“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以及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④可见，在史密斯的定义中，文化、历史、价值观的主观因素对民族认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中国学者王希恩则将民族认同定义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⑤从二者对民族认同的定义中可知，民族认同首先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心理，其中民族的历史、价值观、象征物等在民族认同的形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认为民族认同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地理环境；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历史；以民族主义者为主的民族精英的推动。认同或民族认同是社会认知的一种。“社会认知是认知主体与客体的交往过程中观察、

^① 王希恩：《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第3-4页。

^② 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③ 王希恩：《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第6页。

^④ Anthony Smith,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Polity Press, 2010, p.17.

^⑤ 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了解并形成判断的一种心理活动”。^①可见，民族认同是民族之间互相交往的产物。民族之间交往的前提则是地理环境的限制。所以，由于突厥民族和库尔德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下，因而二者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频率也有所不同。突厥民族生活于小亚细亚半岛安纳托利亚一带。北临北海，西临爱琴海，南濒地中海，东接亚美尼亚高原。地势主要由安纳托利亚高原和西部低矮山地构成，南部是托罗斯山脉，北部是庞廷山脉。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三面环山，一面开放的地理格局。而库尔德人生活于库尔德斯坦地区，该地位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四国的交界之处，地势复杂。“中东地区的地理状况十分复杂，库尔德地区尤其如此，地形地貌缺乏明显的共同特征。比起阿拉伯半岛等沙漠地区，这里拥有更多的山峰，到处布满了丘陵、峡谷和盆地，中间夹杂着凌乱的小块平地”。^②库尔德学者哈坎·亚伍兹也在其论文中指出地理环境阻碍了库尔德民族认同的形成“库尔德民族是处于波斯，阿拉伯和土耳其世界十字路口的民族。这使得他们有高度的自治。库尔德部落之间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有松散的联系。多数库尔德人住在山地，这使得他们与其他民族相互隔绝。地理因素成了库尔德认同碎片化的主要因素”。^③所以，与库尔德民族相比，相对开放式的地理环境使得突厥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有着更为频繁的交往，尤其是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被瓜分殆尽，这进一步激发了突厥人的民族意识；而近乎封闭式的地理环境使得库尔德人几乎与外界并无交流，而且其自身还处于部落结构之下，这也使得库尔德人对部落的认同远强于民族认同。

除了地理环境外，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历史也对民族认同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每一个民族的历史虽然受着社会发展的制约，但具体的历史经历则由无数个偶然因素所构成。偶然因素的多样性，决定了各个民族历史的多样性”。^④因此，不同的历史经历也成了民族认同的重要一环。在土耳其国家成立后，凯末尔主义者正是通过重构突厥民族的历史来塑造整体的民族认同。凯末尔将突厥民族的历史追溯到赫梯文明与苏美尔文明时期，通过强调突厥民族的古老来突出民族的伟大，进而唤起突厥人的民族自豪感。

1920年《色佛尔条约》的签订，土耳其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为此国家成立后将条约的签订日定为“国耻日”并将其编入历史教材。通过重构民族历史以

^① 王希恩：《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第5页。

^②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

^③ M. Hakan Yavuz, “Five Stag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Kurdish Nationalism in Turkey”,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7, No.3 (2001), p.4.

^④ 王希恩：《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世界民族》2003年第4期，第11页。

及设定国耻日等方式，凯末尔主义者进一步加深了突厥民族的整体认同。库尔德民族中虽然也有民族主义者意识到了历史对库尔德民族认同培养的重要性，但也仅限于少数库尔德精英内部。相比于历史，伊斯兰教在库尔德认同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宗教认同成了库尔德民族认同的主体，但库尔德地区的宗教也有所区别，主要以逊尼派为主，但也有少数阿拉维等其他教派。宗教信仰的分歧进一步影响了库尔德人的整体认同。

相比于地理环境以及民族历史，杰出人物在民族认同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王希恩先生所说“一般来讲，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物总是民族意识的最早觉悟者和传播者……正是由于最先觉悟的精英分子的推动，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才会浸润到社会各个阶层”。^①民族精英对民族认同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社会活动上，民族的历史会因他们而改变，而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表现也会成为塑造民族认同的重要力量。在近代突厥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两位民族主义者，他们对突厥民族认同的培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位便是突厥主义的集大成者：齐亚·格卡尔普。他生于土耳其东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带有一丝的库尔德血统，但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由于其极力推崇突厥主义，所以否定了他的库尔德身份。齐亚·格卡尔普的突厥主义为后来突厥民族的认同打下了基础。“格卡尔普清楚的意识到他自己生活于一个民族和民族主义时代。他热衷于坚持民族理想，赋予民族以神圣特质”。^②以此为原则，格卡尔普通过重塑突厥民族历史来激发突厥人的觉醒。“格卡尔普通过‘托古改制’的方法，即通过‘再发现突厥民族的过去与历史来衔接过去与未来’”。^③所以，格卡尔普的任务就是促进当时突厥民族的觉醒，使突厥人适应当时民族主义的状况。

继格卡尔普之后，突厥民族中出现了另一位精英即凯末尔。凯末尔于1881年出生在萨洛尼卡。作为土耳其革命先驱，凯末尔早在1908-1909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中展露锋芒。一战的爆发不仅凸显了他的军事才能，同时也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1920年的《色佛尔条约》令土耳其处于亡国的危机之中。这一关键时期，凯末尔扛起了民族复兴的重任。在他的领导下，民族主义者们发起了独立战争，最终击败了英、法、希等国家，挽救了民族危亡。在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以齐亚·格卡尔普的突厥主义为基础，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在语

^① 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② 咎涛：《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论齐亚·格卡尔普托古改制式的民族主义》，《西亚非洲》2008年第8期，第21页。

^③ 咎涛：《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论齐亚·格卡尔普托古改制式的民族主义》，《西亚非洲》2008年第8期，第22页。

言、文化、历史等方面，政府塑造突厥的民族认同，同时也组建了“人民之家”等组织来作为培育民族认同的机构。

总之，在齐亚·格卡尔普以及凯末尔等突厥民族精英的推进下，突厥民族认同逐渐塑造完成，从而使得突厥民族成了一个成熟民族。而对于库尔德民族来说。在其民族发展历史中也不乏一些诸如乌贝杜拉、贝迪尔可汗、优素福齐亚贝格以及谢赫赛义德等开明的库尔德精英们，他们对库尔德民族认同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总体来看，库尔德民族认同也仅限于少数库尔德精英中。这一方面与库尔德人的地理环境以及传统的部落结构相关，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库尔德精英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一个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是需要人为努力的。杰出人物和普通民众所体现的认同，它的最初状态都是自在的和分散的。这种状态要想为民众所接受，就要有民族精英和思想家来进行传播。对于库尔德民族来说，民族意识只存在于少数民族精英手中，而且他们由于自身所代表的利益不同而存在分歧。从而影响了民族意识的传播和库尔德民族认同的形成。对于一战后的突厥民族主义精英们而言，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与宗旨，那就是捍卫国家独立与统一，共同的目标促进了民族精英们的团结。而且在建国后，凯末尔又在格卡尔普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土耳其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形成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在民族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化过程中，民族认同是其重要标志，只有拥有了民族认同的民族才是一个自觉民族和成熟民族。在民族认同的培育上，地理环境、历史和民族精英有着重要作用。而突厥民族相对开放的地理环境；民族主义者对民族历史的塑造；突厥民族精英对民族认同的激发和培育最终成功塑造了突厥民族认同，从而使突厥民族成了成熟民族。库尔德民族则成了落后民族。突厥民族的成熟也使得突厥人抢在库尔德人建国之前建立了民族国家。突厥民族成了国内的主体民族，因而在土耳其的民族国家构建中，国家精英们强行将突厥民族认同打造为国家认同，因而出台了一些极端的民族政策对库尔德人等少数民族进行打压。那么，突厥民族作为一个成熟民族，是否有权利对库尔德民族进行打压呢。

第三节 成熟民族应尊重落后民族的权利

突厥民族的成熟最终使得在其与库尔德民族抢先建立国家的竞赛中获得胜利，从而在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民族国家，成了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员。突厥

民族是凯末尔要建构的土耳其民族的主体，而居住在东南部山区的库尔德民族则成了少数民族。土耳其国家成立后，以凯末尔为主的国家精英开启了以现代化为目的的民族国家建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凯末尔等人采取了诸如语言同化、强制迁移、身份否定以及世俗化为主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强制将库尔德民族纳入到土耳其民族之中。这些政策最终导致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爆发了谢赫赛义德叛乱等一系列叛乱行动，危害了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而这些叛乱发生的原因也正是由于突厥民族对库尔德民族的压迫所致。那么，作为主体民族的突厥民族是否有权对库尔德民族进行打压呢？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主要由民族国家构成，民族国家成了国际体系的重要行为体。在每个民族国家之内又存在着多个少数民族，他们是民族国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今世界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无论是大民族、小民族、成熟民族还是落后民族“在它已经和别的族体实行普遍杂居、混居或者在地域的分布上大分散、小集中的情况下、以及在它虽有相对集中的人口和地域而已经和别的族体结成难以割舍的历史命运的情况下，都在结构上失去了单独建国的可能性”。^①虽然当今时代下的各族体失去了独立建国的可能性，但在各民族国家之内，任何民族都有权像别的民族一样有同等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公民权等相关权利；有权平等地参与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中；有权要求国家保障其自身权利；有权要求以同等的资格加入到民族国家建设之中。

当今世界，民族国家建构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所以民族国家内的各族体就要适应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建设同质文化的需要。然而，当今依旧有少数民族受到国内主体民族的压迫与迫害。所以，对那些少数民族来说，倘若占有权力和资源优势的主体民族拒绝改变少数民族受压迫的地位，那么少数民族是无法容忍这些没有报偿的牺牲的，从而便会爆发对主体民族的反抗。土耳其政府忽视库尔德人自身的民族特性，强行对库尔德人进行同化就是绝佳例证。政府的极端民族政策最终导致了库尔德人的叛乱，直接影响到土耳其政局的稳定。所以，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土耳其政府的民族政策是塑造统一民族认同，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但从民族权利的角度看，土耳其政府极端的民族政策是对库尔德民族的压迫，是库尔德民族无法容忍的，也是国际社会所不容许的。

^①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6 页。

总 结

以上,本文从国际关系、国家建构及民族主义三个方面对土耳其库尔德政策进行了评析。最后,本文将重点对国际关系、国家建构及民族主义三个视角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他们对土耳其库尔德政策影响的程度做一个总结。

首先,从土耳其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的关系来看。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所面对的首要任务便是巩固国家的统一,打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完成这些目标的关键就在于进行国家建构。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及的,土耳其的国家建构包括两个环节即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民族建构指的是“由民族国家所引领的、在国家领土疆域范围和政治框架之内进行的,旨在把族权整合为拥有共同政治文化特质的国族的努力过程,其目标是实现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①国家建构指的是“由国家统治阶级依托国家政权力量来主导的,以建立现代国家民主制度为目标实施的一系列互相促发、彼此联系的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现代化的过程”。^②在土耳其国家建构历程中,国家建构的重点则是共和人民党的建立。亨廷顿认为:“政党诚然会刺激腐化,但一个强大的政党的发展将以制度化和公共利益来代替分裂的私人利益。在政党发展初期,政党是以宗派的面貌出现的,这在表面上加剧了冲突和分裂,但当它发展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政党后,它就成了联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且打下了超越地主集团的忠诚和认同的基础……政党为稳定有序的变革而不是为动乱打下了基础”^③。共和人民党的建立,团结了国内各方力量,也为之后的凯末尔改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基础和良好的政治环境。

在民族建构方面,土耳其政府则利用土耳其民族主义来塑造整体的国家认同,通过一系列民族政策将土耳其民族认同打造为国家认同。土耳其进行民族建构的前提是拥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此就需要进行国家建构;而国家建构要想顺利推进则要保证政权的合法性,就需要民族建构。所以,对于土耳其来说,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发展。国家建构为民族建构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制度框架,而民族建构则为国家建构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保证了国家建构的顺利进行。在二者的共同推动下,土耳其拥有了民族对于国家的忠诚,也有了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

其次,从土耳其民族政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来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

^① 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

^② 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第87页。

^③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406.

态,是当今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基础。如前所述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建构主要分为两个过程:其一在于建立民族国家,其二是在既有国家框架内进行民族整合,将不同的民族认同打造为国家认同,进而保证政权的合法性。因为,合法性是一国政府得以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实现内部治理的重要基础。合法性的来源便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被现代国家视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只有依靠民族主义才能对外确定国家边界,对内寻求对国家的认同。”^①对于土耳其来说,1923年共和国的建立即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建立,之后的任务便是进行民族建构。为此,要想顺利推进民族建构,就要实行相应的民族政策,民族主义也就成了国家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安东尼·史密斯将民族主义分为两种类型即公民-领土型民族主义与族裔-血缘型民族主义。其中公民领土型民族主义产生于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因为其在独立前的目标是“驱逐外国统治者,并以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代替被殖民的土地”而独立后其目标变为“将不同的多族群人口联系在一起整合成新的政治共同体”。^②而族裔-血缘型民族主义产生于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其在独立前的目标是“致力于从更大的政治单元中分离出来,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新的‘族裔民族’”;^③独立后的目标则是致力于对外扩张。根据这两种划分方式可以看出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建构民族国家,推进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正威胁着主权国家的统一,制造和扩大民族之间、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阻碍民族国家一体化建构的重要力量,甚至危机民族国家的存续”。^④在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民族建构的重要力量。民族主义的原则已经成为日常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国家政治与文化生活的一个根本原则。它强调在土耳其社会中把民族主义作为促进人民团结的重要纽带。土耳其民族主义强调共和国的单一属性,将土耳其认同塑造成统一的国家认同。凯末尔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主要分为三个内容“强调建立一个以土耳其民族为基础的地域性国家;主张民族自决权是合法的,民族的荣誉不容侵犯,民族的独立自由是土耳其人生存的前提;大力培养和提高土耳其意识。”^⑤

总之,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来说,凯末尔的民族政策为塑造统一的民族认同,维护国家稳定奠定了基础。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安全,土耳其政府固然可以利用民

^① 王文奇:《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析论》,《史学集刊》2011年第3期,第108页。

^②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enguin Books, 1991, p.82.

^③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82.

^④ 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⑤ 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73页。

族主义来执行相应的民族政策，但对民族政策的执行上，由于以凯末尔为首的国家精英急于将土耳其打造为西式的现代化国家，从而在相关政策上操之过急，强行将突厥民族认同确定为统一的国家认同。为此，原本的公民民族主义^①变为了族群民族主义^②，即突出突厥民族的主体地位，强行将库尔德民族同化到突厥民族中。这种民族同化政策一定程度上同化了库尔德人，但却牺牲了他们自身权益，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反抗。所以，一方面民族主义为土耳其国家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与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又成了突厥民族用来压迫库尔德民族的工具，最终导致了库尔德人的叛乱。

其三，从国际体系的变动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影响上来看。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除了是由于齐亚·格卡尔普以及凯末尔等民族主义者的推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国际政治的发展相关。国际政治的发展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产生的影响可分为两个阶段来考量，即维也纳体系阶段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阶段。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登上帝位，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登上帝位的拿破仑开始对外扩张，为了防止他称霸欧洲，英、俄、普、奥等国组建了反法联盟。1815年第七次反法战争结束，拿破仑帝国覆灭。反法战争的胜利使得欧洲各国意识到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必要性。1815年英、法、俄、普、奥等国在维也纳签订条约，建立了以均势和补偿原则为主的国际体系即维也纳体系，奥斯曼帝国也成了体系内的一员。维也纳体系的建立不仅对奥斯曼帝国，而且也对其境内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入到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已行将就木，成为西方列强觊觎的对象，但帝国并未因此而消亡，反而存活了一段时间。究其原因在于，1815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属于多极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列强间形成了一种均势格局。在这种均势体系下，列强间相互牵制，谁也无法单独获得奥斯曼帝国的庞大遗产，因而在这种格局之下，帝国又存续了一段时间。列强间的相互牵制虽然给予了帝国喘息时机，但各欧洲强国依旧采用自身方式对帝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上的渗透。在这种环境下，西方民族主义思潮最终传入到了帝国境内，进而使得突厥民族有了民族主义意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列强从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而且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崛起，成了英、法老牌资

^① 公民民族主义以公民和领土为基础，致力于将迥然不同的多族群人口整合为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以培养公民对国家的认同，维护国家的统一。

^② 族群民族主义以族裔和血缘为基础，致力于从更大的政治单元中分离，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族裔国家”，对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

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者。列强间矛盾频发，最终于 1914 年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打破了原有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国际社会面临着重建国际体系，重塑国际秩序的重任。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错误的站在了同盟国一方，最终沦为了战败国并于 1918 年签署了《摩得洛司停战协定》，成了协约国的瓜分对象。

早在 1916 年英、法便秘密签订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划分了各自势力范围，这也为 1920 年《色佛尔条约》的签订提供了基础。一战后，战胜国分别在巴黎和华盛顿召开战后会议，建立了以一系列条约为基础的新的国际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色佛尔条约》则是构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体系的重要条约之一。条约签署后，英国、法国、希腊和意大利等国企图瓜分土耳其。土耳其国家处于危机关头，进一步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众多民族主义者开始组建各种民族主义组织来进行抗争，拯救国家，救亡图存。1918 年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的提出，又为土耳其的民族独立提供了依据。最终，凯末尔统一了各类民族主义组织，在他的带领下，民族主义者们发起了独立战争，打败了侵略者。1923 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土耳其成了国际体系内的一员。在这一体系下，土耳其开始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土耳其民族主义因而也成了国家建构的主导思想。

总体来看，国际关系、国家建构以及民族主义三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联系，共同对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产生了作用。国际体系的变动以及大国之间的政治，一方面促进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土耳其国家的独立和此后的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时机和稳定的国际环境。土耳其国家成立后的首要任务便是进行国家建构，而国家建构的核心便是培养统一的民族认同，从而使得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成了国家建构的主导思想。作为国家建构主导思想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一方面为土耳其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构建，从而使得土耳其更快速的融入到国际体系之中。

土耳其极端化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库尔德人的叛乱，从而危害了国家统一，阻碍了国家建构历程。那么对于土耳其来说什么样的民族政策才能更好的将库尔德人纳入到国家建构之中呢？关于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方式有多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民族的文化差异，即在将少数民族融入到国家中之时，更要考虑到他们的文化差异。因为从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民族分离的权利，如果不能合理的调适民族文化差异，分离就会随时威胁多民族国家的

主权完整。一旦少数民族认为他们自身的民族利益无法被满足，就会考虑分离。为此，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提出了一种联邦制。这种联邦制的核心是通过划分邦与邦间的界限，使少数民族在邦内占比例的多数。^①这种联邦制在西方民主国家成功实行，但对于土耳其东方式的威权国家来说，联邦制意味着一党制期间建立起来的威权政体的失效。不仅如此，还会破坏国家的统一，更不利于共和国初期的国家建构行动。

第二种则是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给予少数民族自治权利。既尊重了少数民族的自身特性，又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不同的是，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民族是被迫纳入到土耳其国家中，而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则是长久以来不断融合交往的结果。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原本生活在库尔德斯坦地区，但一战后被迫纳入到了土耳其等周边国家内部，这就使得他们很难与土耳其这个新国家之间建立起共同情感，特别是在 1924 年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后，土库两个民族间的唯一纽带被斩断。而且由于库尔德民族属于跨界民族，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影响，这对于土耳其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为此，笔者认为，土耳其国家建构的最好方式便是在维持主体民族地位，培养土耳其民族认同的同时，也要给予库尔德人自身民族情感表达的机会。同世界上所有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一样，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土耳其共和国内的库尔德人也有自身的民族认同与民族情感。这些民族情感更多的寓意在象征、神话、记忆、价值等主观因素以及领土、地理等客观因素中。他们也有他们自身的先祖神话、神选神话、黄金时代以及为民族而自我牺牲的英雄。强制性的同化措施虽然培养出了他们的土耳其民族认同，但实际上这进一步又唤醒了他们自身的民族认同，让他们意识到了自身的民族特性。从而激发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所以，对于土耳其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维持主体民族地位与认同的同时，给予库尔德人自身民族情感表达的机会。这样才能将库尔德人更好的纳入到国家建构之中。

^① 威尔·金里卡著，邓红风译，《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4 页。

参考文献

（一）英文文献

1. 英文著作

- [1] Asa Lundgren , *The Unwelcome Neighbour-Turkey's Kurdish Policy*, I.B.Tauris & Co Ltd, 2007.
- [2] Anthony D. Smith, *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A Cultural Approach*,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9.
- [3]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enguin Books, 1991.
- [4] Anthony D. Smith,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Nations Hierarchy,Covenant and Republic*,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 [5] Anthony D. Smith, *The Ethic Origios of Nations*, Blackwell Publishing, 1986.
- [6] DavidMcDowall, *A Morden History of The Kurds*, I.B.Tauris Co.Ltd, 2007.
- [7] Denise Natali, *The Kurds and State:Evolving nation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8] Derya Bayir,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in Turkish Law*,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2.
- [9] Djene Rhys Bajalan, “The Kurdish Movement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1880–1923”, in Hamit Bozarslan, Gengiz Gunes and Veli Yadirgi(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Kur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 [10] Edgar Oballance, *The Kurdish Struggle 1920-1924*,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 [11] Erik J. Zu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 B Tauris, 2003.
- [12] Fuat Keyman, “Nationalism in Turkey:Modernity, State, and Identity”, in Yfe Kadtoglu and E. Fuat Keyman (eds), *Symbiotic Antagonisms: Competing Nationalism in Turke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1.
- [13] Hamit Bozarsalan, “Kurdish Nationalism in Turkey:From Tacit Contract to Rebellion”, in Abbas Vali (eds), *Essay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Zazad Publisher, 2003.
- [14] Hakan Ozoglu, “Does Kurdish Nationalism Have a Navel?”, In Ayse Kadtoglu

- and E. Fuat Keyman (eds), *Symbiotic Antagonisms :Competing Nationalism in Turke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1.
- [15] Hakan Ozoglu, *Kurdish Notables and the Ottoman State:Evolving Identity,Competing Loyalties,and Shifting Boundari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 [16]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lfred A. Knopf, 1948.
- [17] Hans Koh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Robert E K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 [18] Kendal, “Kurdistan in Turkey”,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Olive Branch Press, 1993.
- [19] Kendal, “The Kurds under the Ottoman Empire”, in Gerard Chaliand (eds.), Michael Pallis (trans.), *Kurd and Kurdistan-A People Without Country*, Olive Branch Press, 1993.
- [20] Kemal Kirisci, “Migration and Turkey: the dynamics of 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Resat Kasaba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Turkey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1] Kemal Kirisci and Garrth M. Winrow, *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 An Example of a Trans-state Ethnic Conflict*, Routledge Curzon, 2003.
- [22]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 [23] Metin Heper, *The State and Kurds in Turkey-The Question of Assimil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24] Martin Van Bruinessen, *Agha, Shaikh and State-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Kurdistan*, Zed Books Ltd, 1992.
- [25] Michael M. Gunter, *The Kurdish Ascending:The Evolving Solution to the Kurdish Problem in Iraq and Turkey*,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26] Mesut Yegen, “Kurdish Nationalism in Turkey,1898–2018”, Hamit Bozarslan, Gengiz Gunes and Veli Yadirgi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Kur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 [27] Henri J. Barkey and Graham E • Fuller, *Turkey’s Kurdish Ques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 [28] Resta Kasaba,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Turkey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9] Robert Olson, *The Emergency of Kurdish Nationalism and The Sheikh Said Rebellion, 1880-1925*,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9.

[30]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2. 英文论文

[1] Anthony Smith, “Nations and Their Pasts” *Nation and Nationalism*. Vol.2, No.3(1996).

[2] Dicle Cemiloglu, *Language Policy and National Unity: The Dilemma of the Kurdish Language in Turkey*, <http://repository.upenn.edu/curej/97>.

[3] Djene Rhys Bajalan,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Question of Kurdish Statehood: A ‘Missed’ Opportunity?” *Ethnopolitics*(2018).

[4] M. Hakan Yavuz, Five stag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Kurdish nationalism in Turkey,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2001) ,<https://doi.org/10.1080/13537110108428635>.

[5] Nur Bilge Criss, “The Nature of PKK Terrorism in Turkey”,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18(1995).

[6] Rusen Çakir, “Kurdish Political Movement and the“Democratic Opening” *Insight Turkey*, Vol.12 ,No.2(2010).

[7] Yilmaz Ensaroglu, “Turkey’s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Peace Process”*Insight Turkey*, Vol.15, No.2(2013).

（二）中文文献

1. 中文专著

[1]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2] 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3] 哈全安 周术情：《土耳其共和国政治民主化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 2010 年版。

[4] 哈全安：《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5] 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 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6] 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 2014 年版。

- [7] 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
- [8] 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
- [9]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10] 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11]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12] 威尔·金里卡著，邓红风译，《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5 年版。
- [13] 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14] 塞缪尔·亨廷顿著，李圣平，杨玉生等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
- [15] 弗朗西斯·福山著，郭华译，《国家建构，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学林出版社 2017 年版。
- [16]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 [17]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 [18]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 [19]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20] 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2. 学位论文

- [1] 张学琼：《当代中东库尔德问题》，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
- [2] 张屹：《当代库尔德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

- [3] 赵谦洁：《谢赫赛义德叛乱与土耳其早期库尔德民族国家构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 [4] 周雨佳：《冲突视角下土耳其的库尔德语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 [5] 黄琨：《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 [6] 杨玉龙：《现代中东库尔德政党研究：起源，嬗变和现实》，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 [7] 李娟：《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之间关系的嬗变》，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 [8] 邓蜀生：《伍德罗·威尔逊》，转引自蔡珊珊《列宁与威尔逊民族自决思想的比较》，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3. 中文期刊

- [1] 敏敬：《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落》，《世界民族》2004年第6期。
- [2] 田文林：《英国在中东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及后果》，《西亚非洲》2020年第3期。
- [3] 严天钦：《土耳其化政策与土耳其的民族认同危机》，《世界民族》2018年第2期。
- [4] 孙建中：《论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权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 [5] 《列宁选集》第二卷，转引自孙建中：《论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权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 [6] 王建廷 莫非：《民族自决权的内涵及其演变》，《社科纵横》2006年第5期。
- [7] 贺金瑞 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 [8] 咎涛：《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论齐亚·格卡尔普“托古改制”式的民族主义》，《西亚非洲》2008年第8期。
- [9] 丁虹：《民族主义与现代性：基于新兴民族国家的分析》，《中共福建省委

党校学报》2019 年第 3 期。

[10] 王希恩：《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世界民族》1999 年第 2 期。

[11] 王希恩：《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世界民族》2003 年第 4 期。

[12] 肖文超：《奥斯曼帝国时期境内库尔德问题的历史演变》，《世界民族》2021 年第 1 期。

[13] 潘志平：《论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史学集刊》2004 年第 4 期。

[14] 杨凌林：《浅析泛突厥主义》，《重庆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4 期。

[15] 敏敬：《“凯末尔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关系探析》，《世界民族》2006 年第 6 期。